

左派幼稚病

著者 V. I. Ulianow

譯者 吳 涼



中國社會科學研究學會出版

04.3

151

目 錄

1. 第一章 俄國革命的意義國際意義何在？
2. 第二章 布爾塞維克黨人勝利底主要條件之一
3. 第三章 布爾塞維克主義史中之主要級段
4. 第四章 在工人運動內與何種敵人爭鬥才使布爾塞維克主義成長壯大和堅固起來
5. 第五章 德國的“左派”共產主義
6. 第六章 革命黨人應否在反動的職工會內作工
7. 第七章 應該參加資產階級的議會嗎？
8. 第八章 絕不妥協嗎？
9. 第九章 英國的“左派”
10. 第十章 幾個結論
補遺
人名索引

125539

24
1939
1939

左 派 幼 稚 病

列 寧 著

1929.8.9.
大專送我的
列寧

上 海 華 興 書 局 發 行

1 9 3 0 . 2 . 2 0 初 版



每 冊 實 價 大 洋 四 角

左 派 幼 稚 病

第一章 俄國革命的國際意義

何在？

在俄國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俄舊歷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即西歷十一月七日）後的最初幾個月看來，似乎落後的俄國與先進的西歐各國的極大差異，要使將來西歐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會合俄國很少相似是的。現在我們已經有了很豐富的國際經驗，這些經驗十分明確地指示我們革命在幾個主要表徵，並非祇有地方的，特殊民族的單獨俄羅斯的，而的確含有國際的意義。我這裏所謂國際的意義，並非就其廣義而言，如果就我們革命對於各國的影響而言，則我們革命中，不祇幾個表徵，而且一切主要的和許多次要的表徵，都有國際的意義。

• 不是的，我乃是就字的最狹意義而言，此地所謂國際的意義，是指已實現於俄國的，要在國際上覆演的國際意義或歷史必然性。這樣去看，那麼應該承認我們革命中某幾個主要表徵，是具有這樣的國際意義的。

如果誇張這個真理，把他引伸到幾個主要表徵以外，那自然是很大的錯誤。同時將來如果在任何一個先進國內，無產階級革命得到勝利，那麼很可能地又會發生一種劇變：那時俄國再不能以模範自居，而又成爲落後的國家（就社會主義的與蘇維埃的意義而言），假若忽略了這一點，也同樣是錯誤的。

但是在目前歷史的階段上，俄國的模範，總已多少給各國指出他們在最近將來所不可避免的某種切身事實。各國先進的工人早已懂得此點——雖然舊時並不能那樣完全懂得，但他們却真能以革命階級的本能感覺到把握到這些。由此可見蘇維埃政權以及布爾塞維克主義之理論與策略根據的國際意義（狹義的說）。可是第二國際“革命的”領袖們，和德國的考茨基（Karl Kautsky）奧國的鮑宛爾（Otto Bauer）阿得來（Friedrich Adler）之流，却全不能理解此點，所以他們也就因此成爲反動者，成爲最下流機會主義與叛賣階級行爲的辯護士。就中一九一九年在維也納出版之“世界革命”的小冊子，特別明顯地表顯了他們底整個思想進程和思想範圍；正確點說，表現了他們底昏聩，淺薄，卑劣與甘心叛賣工人階級利益等的喪心病狂——而這一切，却都在“保障”“世界革命”這一理想的美名下進行的。

關於這本小冊子，祇能以後有機會時再來詳細評論，現在我們只要再說明一點：在很久很久以前，當考茨基還是馬克思主義者，尙非叛徒的時候，他以歷史家的態度，去研究問題，他預先看到將來會有這種形勢，使俄國無產階級底革命性，將成爲西歐的模範。這還是一九〇二年的事，當時他爲革命的火星報，作“斯拉夫人與革命”一文，內面會說：

現在（和一八四八年相反）我們不僅可以說斯拉夫人已經加入了革命民族的隊伍，而且可以說，革命思想與革命行動底重心，已逐漸移轉到斯拉夫人身上去了。革命的中心，自西方移向東方，十九世

第二章 布爾塞維克黨人勝

利底主要條件之一

現在想任何人都看到了，如果我們黨內沒有真正鐵的嚴格紀律，如果沒有全體工人階級羣衆盡心竭力的擁護；即是說如果沒有能深思，忠實，捨身作則具極大影響，能領導和吸引落後成份的那些人的擁護，則布爾塞維克黨人不但不能撐持兩年半政權，便兩個半月也撐持不住的。

無產階級專政是新階級向其更有力的敵人——向資產階級的最堅苦最激烈無情的戰爭。資產階級雖然在一國內被推翻，然其反抗力必更加强十倍。因其勢力不僅建立在國際資本底力量上，不僅建立在資產階級之國際密切聯繫上，而且也建立在習慣力與小生產底權力之上。不幸小生產留存下來的還很多很多，他可以每日每時不斷地自然地大量地胎生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的種子。因此之故，無產階級專政是必要的；如無長期的，堅決的，生死的戰爭，——即具有耐甘苦，守

紀律，剛毅勇敢，不屈不撓，意志統一這種精神的戰爭，就決不能戰勝資產階級。

我再重說一遍，俄國無產階級勝利的專政底經驗，已給一般對此問題沒有理解頭緒或不曾理解過的人們以一清楚的指示；即無條件的集中化與無產階級嚴格的紀律，乃是戰勝資產階級的主要條件之一。

這句話說的多了，但他到底是甚麼意思，在何種條件之下才有可能，一般人却很少加以着想。除對蘇維埃政權及布爾塞維克黨人致歡祝詞外，是否更應尋常對於布爾塞維克黨人，何以能夠造成革命無產階級所不可缺的紀律之原因，作深湛的標分？

布爾塞維克主義之成爲一種政治思潮，一個政黨，實自一九〇三年始。只有布爾塞維克主義存在的全期歷史，才能充分說明布爾塞維克主義何以能够在最困難的情形下面，養成而且保持無產階級勝利所必需的鐵的紀律。

這裏最先發生的問題，就是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紀律，係建立在何種基礎之上，怎樣去運用它、鞏固它？第一，在於無產階級先鋒隊的自覺性，及其對於革命的忠心，堅毅力，犧牲精神和英勇氣概。第二，則在於能同廣大勞動羣衆——首先同無產階級，同時也要同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羣衆——聯絡，接近，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可說和他們連成一片。第三，在於此先鋒隊所實現的政治領導之正確，政治的策路與戰略之正確，而且要使廣大之羣衆，能由自己的經驗，確信它的正確。倘若沒有這些條件，則在一個革命的政黨中，即真正配作那推翻資產階級，改造整個社會的先遣階級之代表的政黨中，便沒有辦法來實現紀律。沒有這些條件，則凡一切建設紀律之企圖，都將不免流爲虛誕空談和笑話。此外，這些條件不是一下子所能夠產生的。只有經過長期工作，困苦經驗，才會產生。正確的革命理論，變促進他們的形成。此理論自身，並非信條，而是在與真正羣衆革命運動底實際

的親密結合中，鍛鍊出來的。

布爾塞維克主義在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〇年異常困難的情形下面，所以能够造成和實現最嚴格的集中與鐵的紀律，其原因則在於俄國無數歷史的特徵。

一方面，布爾塞維克主義，站在馬克思理論底最堅固的基礎上，於一九〇三年產生。這個——也只有這個——革命理論的正確性。不但由整個十九世紀中全世界的經驗所證明，而且更特別由俄國革命思想中之迷罔與游移，錯誤與失望等等的經驗，證明其千真萬確。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半世紀中，處於極端蠻暴與反動的沙皇底壓迫下；俄國進步的思想界，曾熱烈地尋求正確的革命理論，以驚人的憤懣與縝密，探索歐美關於這方面的“最後一言”。俄國以半世紀內空前的困苦與犧牲，驚人的革命勇氣，非常的毅力與熱誠，探索和研究，實際的考察，失望，試驗，歐洲經驗的參照等等，方領悟馬克思主義是唯一正確的革命理論。因為沙皇帝制所逼迫，不得不出亡外國。所以革命的俄國，在十九世紀之後半期，獲得這樣豐富的國際關係，能這樣地熟知革命運動底世界形式與理論，使之為世界上任何國家所不能及。他方面，在花剛石似的理論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布爾塞維克主義，又重過十五年（一九〇三至一九一七年）的實際歷史；其經驗之豐富，無他國可與比擬。就革命之經驗言，就各種合法的與非法的，和平的與暴烈的，秘密的與公開的，小團體的與羣衆的，議會主義的與恐怖主義的等等運動轉變的迅速和複雜言，任何國家在此十五年內，不能與俄國所經歷者同日而語。在這樣短的時期內，沒有一個國家，能像俄國，匯集這樣多的現在社會內一切階級間鬥爭底形式，形象，與方法。因俄國之落後，與沙皇的殘暴壓迫，這種鬥爭更加速成熟。這種鬥爭使俄國特別熱烈地敏捷地領悟歐美政治經驗之“最後一言”。

第三章 布爾塞維克主義 史中之主要階段

革命的準備時期（一九〇三——一九〇五）

到處感覺到大風暴之逼臨。在一切階級內，醞釀與準備。國外僑民底報紙，在理論上提出了革命的一切根本問題。三個主要階級即三個主要政治派別——資產階級自由派，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掛着“社會民主”與“社會革命”招牌的派別），與無產階級革命派——底代表，以綱領上與策略上的苦戰，預示和準備將來公開的階級鬥爭。凡羣衆在一九〇五——〇七年，與一九一七——二〇年間用武裝鬥爭以求解決的一切問題，都可以（而且必須）在那時報章上，追尋他的雛形。在這三個主要派別中間，自然還有無數其他居中的，過渡的，動搖的形式。正確點說，在機關報，政黨，政派，政團等的鬥爭上，形成了真正階級的政治思想的派別。各階級鍛鍊着他們思想上與政治上的武器，以準備着未來的廝殺。

革命時期（一九〇五——一九〇七）

一切階級都明顯的出場了。一切綱領的與策略的見解都為羣衆行動的校正。罷工鬥爭之擴大與激烈，為空前所未有。經濟罷工一轉而為政治罷工，政治罷工再轉而為暴動。領導的無產階級與遊移不定被領導的農民中間之關係，得到實際上的校正。在鬥爭底散漫的發展中，產生了蘇維埃的這種組織形式。那時關於蘇維埃意義之爭論，已預示一九一七——二〇年間未來的偉大鬥爭。議會形式鬥爭與非議會形式鬥爭，抵制議會策略與參加議會策略，鬥爭之公開形式與非公開形式及其相互關係與聯絡等等之轉變，都令人驚訝其內容之豐富。若就羣衆與領袖，階級與政黨對於政治科學原理的學習而言，則這時期底每一月，實等於“和平的”“憲法的”發展中之一年。沒有一九〇五年的“總演習”，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之勝利，將成為不可能。

反動時期（一九〇七——一九一〇年）

沙皇帝制勝利了。一切革命的與反對政府的政黨，都失敗了。消沉，頹廢，分裂，解體，叛變，與夫風月的詞章代替了政治的地位。唯心論的哲學趨向加厲了；神祕玄學，成為掩飾反革命情緒的工具了。但同時亦即因這種大失敗，正給革命政黨與革命階級以真正的最有效的教訓：給以歷史辯證法底教訓，給以領導政治鬥爭的理解，能力，與藝術的教訓。患難中正可以結識知交。戰敗的軍隊，正可以學得許多很好的經驗。

勝利的沙皇，不得不將資本主義前期的，宗法社會的殘餘，趕快加以掃除，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前進甚速。

於是一般超越階級和非階級的幻想，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的幻想，亦從此煙消雲散。階級鬥爭，乃在旗幟更顯明的新形式上，向前發展着。

革命的政黨必須不斷地學習，他們學習了怎樣進攻。但現在還須要懂得怎樣正確地退却的科學，以作進攻科學之補充。他們須懂得——革命的階級已在自己痛苦的經驗中懂到了——如果不學會正確的

進攻和正確的退却，就不能期望勝利。在這次被打敗的反對黨和革命黨中，布爾塞維克黨最退得族職不紊，其“軍隊”之喪失最少，主力之保存最多，分裂最微（就其深淵與不可救藥而言），頹喪最輕，大規模地，正確而果毅地恢復工作之能力最大。布爾塞維克黨之所以能如此，在其能夠無情地搗破并驅逐出一般口頭革命家，這些人不願了解退却的必要，與怎樣退却；他們不了解在最反動的議會中，最反動的職工會中，協作社以及保險會等等組織中學習公開工作之必要。

革命高漲時期（一九一〇——一九一四）

最初發展的非常之慢，到了一九一二年列那事變（*Ergebnisse im Lenagebiet*）以後，便略快些了。經過很大的困難，布爾塞維克人把孟塞維克打退了。孟塞維克黨人祇是工人運動中資產階級的走狗。整個資產階級在一九〇五年以後，早已看清了他們的作用所以盡情幫助他們來反對布爾塞維克黨。如果布爾塞維克黨不善於把秘密工作和“必需利用公開機會”這一原則聯繫起來，而運用之於實際，則必不能得此效果。在最反動的議會中，布爾塞維克黨，卒能獲得了全部工人底議席。

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一九一四——一九一七）

在“議會”極端反動的形勢下，公開的議會政策，給革命無產階級底政黨（布爾塞維克黨）以極大的利益。布爾塞維克黨底議員流放到西北利亞去了。在那時國外僑民底報紙中，一切社會帝國主義，社會狹義愛國主義，社會愛國主義，不徹底的與澈底的國際主義，和平主義，以及革命的反對和平主義幻想的種種意見底形象，都表現得淋漓盡致。第二國際的書齋與老婦們，平素意氣豪揚不可一世地嘲笑俄國社會主義內“派別”複雜，鬥爭劇烈，到這時，當大戰把一切先進國所公稱的“公開”可能取消後，便手足無措起來，甚至連傳俄國革命黨人在瑞士及其他國家自由（秘密）交換思想，自由（秘密）商榷正確意見的這種可能，也不能辦到。正是因為如此，所以那些社會

愛國派與考茨基派，是無產階級的最下流的叛賊。一九一七——二〇年間布爾塞維克主義之所以能夠勝利，就是因為自一九一四年以來，他便無情地揭破社會狹義愛國主義與“考茨基主義”（法國朗格主義Longuetismus 英國獨立工黨首領與費邊派們底見解意大利的屠拉第Turati等盡事一邱之貉）之卑污無恥，羣衆本着他們自己的經驗，自然會確信布爾塞維克見解之正確。

俄國第二次革命（一九一七年二月至十月）

沙皇帝制的無限零落與凋敝（加上痛苦萬分的戰爭之打擊與負擔），造成了一種非常為破壞力，以攻打他自己。幾天的功夫，俄國便變成了德謨克拉西資產階級的共和國，比世界上任何國家（在戰爭情形下）都要自由些。和在很“嚴格的議會主義”的國家內一樣，反對黨，革命黨的領袖，開始組織政府。過去在反動議會中反對黨領袖底聲名，却促進他後來在革命中的作用。

孟塞維克黨人與社會黨人，在幾個星期內，已經得心應手地學會第二國際歐洲的英雄總長老爺們以及其他機會主義浪人們的一切方法手腕與一切論據詭辯了，我們現在讀到李得曼（Scheidmanner）與惱斯克（Noske），讀到考茨基與希爾菲丁（Hilferding）讀到倫乃爾（Renner）與奧斯特里利（Austerlitz），讀到鮑宛爾（Atto Bauer）與阿得雷（Fritz Adler），屠拉第（Turati）與郎基（Longuet），以及英國的費邊派獨立工黨領袖們底東西，總覺得是（事實上是這樣）一種乾枯無味的復述，陳言濫調的重唱而已。然這些，我們都從孟塞維克那裏領教過了。歷史開着玩笑，使落後國家的機會主義者，反凌駕無數先進國家的機會主義者而上之。

第二國際一切英雄們底破產，他們在蘇維埃和蘇維埃政權底意義與作用之問題上的丟醜尤其是現在脫離第二國際的三個主要政黨（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法國朗基黨人，英國獨立工黨）底領袖們，對此問題之窘迫異常，進退維谷，他們為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成見之奴隸

的證實（完全與一八四八年時自命“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小資產者底精神，一般無二），這對於我們並沒有什麼新奇，因我們在孟塞維克底鏡子裏，已經完全看過這些醜態了。歷史開了這樣的玩笑，它使俄國在一九〇五年產生了蘇維埃；在一九一七年二月至十月間，它又使蘇維埃為孟塞維克所改頭換面，而這些人因不能了解蘇維埃之作用及其意義，以至破產。現在蘇維埃的思想，茁生於全世界，以從未有之速度，散播於各國無產階級中間。第二國際的老英雄們，也和我們的孟塞維克一樣，因不能了解蘇維埃之作用與意義，到處破產。經驗已經證明：無產階級革命中的幾個最主要問題的解決，一切其他國家也不得不復演俄國的經驗。

布爾塞維克黨在反對議會制的（實際上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以及反對孟塞維克的勝利的鬥爭上，是經過一番很審慎地發動和準備的，絕不像現在時歐美各國所常遇到的那種意見。在上述時期（二月至十月）底開始我們並不會立即號召推翻政府，而只是說明若不先行變更蘇維埃內部組織底成份及其情緒，想推翻政府是不可能的。我們並不會宣告抵制資產階級的議會，抵制立法會議，而只是說——自一九一七年我們黨底四月會議起，便正式用黨底名義說：有立法會議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比沒有立法會議的好些，但工農蘇維埃共和國，却比任何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議會共和國，又好得多。倘沒有這樣謹慎的周詳的遠大的長期的準備，那麼，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恐怕我們既得不到勝利，更保不住這個勝利。

第四章 在工人運動內與何種敵人 爭鬥才使布爾塞維克主義 成長壯大和堅固起來

第一，並且主要的，是在與機會主義爭鬥；這種機會主義到了一九一四年完全轉成了社會狹義愛國主義，完全轉到資產階級方面，來反對無產階級了。他自然而然的是布爾塞維克主義在工人運動中的主要敵人，在國際的範圍上說來，這個敵人現在還是主要的敵人，布爾塞維克主義在從前和現在，對之都加以極大的注意。布爾塞維克主義在這方面的行動，現在已為國外所熟知。

在講到工人運動中的另一個敵人時，却就不同了。國外還不很知道：布爾塞維克主義是在和小資產階級革命派之長期奮鬥中，發展鍛鍊出來的。這種革命派類似無政府主義，或很多地方自無政府主義剽竊而來。它在根本上，一切主要點上，全背棄了無產階級堅毅的階級鬥爭之條件與需要。理論上，馬克思主義者認定（並且經全歐革

命與夫革命運動的經驗之證實) 小有產者(這種社會成份，在歐洲很多國家內，有極廣大的羣衆代表) 在資本主義下常受壓迫且時常激烈地迅速地陷於悲慘生活和破產。他們容易轉到極端的革命性，但却不能表現堅忍，組織，紀律，剛毅的性質。受了資本主義底壓迫和刺激而“狂放”起來的小資產者，是一種社會現象，他和無政府主義一樣同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固有物。這種革命性之動搖不定，華而不實，最容易走入屈服，灰心，空想之迷途，甚至更被某種資產階級的“時髦”潮流，“瘋狂”似的引誘着，——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真理。革命的政黨，如果只有抽象的在理論上承認這些真理，那仍舊不能免去過去所常犯的錯誤的。這些錯誤，可以出乎意外的在一種新形式下，新外形下，在多少有點新奇的情況下，時常發現出來。

無政府主義，往往是工人運動中機會主義罪惡底特種處罰。無政府主義和機會主義是兩種互相補充的畸形物。俄國居民中，小資產階級成份較西歐各國獨多，但無政府主義在兩次革命(一九〇五與一九一七)與準備革命的時期中，發生影響甚少；其原因一部分是因為布爾塞維克主義能夠盡情地堅決地打擊機會主義。我爲甚麼只說“一部份”？因爲減弱無政府主義勢力的，另有更重要的原因在；原來無政府主義在過去(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曾一度滋榮，因而澈底地暴露出他的錯誤，暴露出他在根本上不能成爲領導工人階級的理論。

布爾塞維克主義自一九〇三年發生以來，即繼承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無情地攻打小資產階級的半無政府主義的(也可以說是同無政府主義眉目傳情的)革命派之傳統；這種傳統總是存在於革命的政黨裏在俄國尤其是從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三年間，當俄國革命羣衆階級的羣衆政黨奠定基礎時，這種傳統，特別的穩固。布爾塞維克主義，繼承並且廣續在三個要點上，向表現小資產階級革命性最甚的政黨宣戰，即同“社會革命黨”鬥爭。第一該黨否認馬克思主義，絕不願(正確點說！不能)了解在每次政治行動前，嚴格估計各階級力量及各階

級間互相關係之必要。第二，該黨以承認個人恐怖，個人暗殺，爲其特殊的“革命思想”與“極左主義”，而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則堅決排斥他們。自然，我們所以排斥個人恐怖，乃從是否適合目的的理由出發至於有人“根本”斥責法國大革命之恐怖，“根本”斥責已經取得勝利而被全世界資產階級所包圍的革命黨之任何恐怖那麼這些人，早在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三年間，已爲普列哈諾夫（Plechanow）（那時他還是馬克思主義者和革命者）所嘲笑所唾棄了。第三，“社會革命黨”以爲其“極左主義”，便在他會嘲笑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較輕的機會主義之罪過，但同時他自己却極力效法德國社會民主黨極端的機會主義者，例如在農民問題或無產階級專政等問題上。

這裏附帶說明一句，歷史在全世界的範圍中，已經證明我們所堅持的意見是對的；革命的德國社會民主黨（須知在一九〇〇到一九〇三年間，普列哈諾夫已經要求開除伯恩斯坦 Bernsten，謹守此傳統的布爾塞維克黨，更在一九一三年極力揭發了勒金 Legien 底卑污無恥和叛黨行動），這個德國社會民主黨，最算近於革命無產階級所需要而能籍以取得勝利的政黨。現在一九二〇年，在經過戰爭期間，與戰後最初數年的一切可恥失敗與恐慌以後，可以明顯看出：在西歐各黨中，剛是革命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產生了最好的領袖，剛是革命的德國社會民主黨，恢復和鞏固的最快。這在“斯巴達團”和“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內的無產階級左派上就可以看到：他們堅決地對考茨基，希爾，菲鼎，勒得保（Ledebour）克里斯品（Crispien）鞏底機會主義與喪心病狂的態度鏖戰。倘然總起來觀察從巴黎公社起到第一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爲止，已經完成的這個歷史階段，那麼顯見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間，有確定的明晰的界限。結果馬克思主義始終總是對的。如果無政府黨人，公平地指摘大多數社會黨在解釋國家的流行見解上之機會主義性，那末，這是因爲：第一，這種機會主義性，乃是由於曲解或甚至捧沒馬克思對於國家的見解。（我在“國”

家與革命”一書中，已經指出了，恩格思有一封信，揭發社會民主黨中在解釋國家的流行思想直機會主義性，異常明顯，嚴厲，詳盡，這信不幸被柏柏爾 Bebel，自一八七五年到一九一一年，收藏了三十六年）。第二，正是歐美社會主義的政黨中忠信於馬克思主義的派別，能够最迅速地普遍地糾正這種機會主義的見解，而承認蘇維埃政權駕乎資產階級議會的民主主義之上。

在上面一項事實上，布爾塞維克主義會大規模與自己黨內的“左傾”趨向鬥爭：第一次是在一九〇八年，爲着參加反動議會以及參加受最反動法律限制的公開工人會社等等問題；第二次是在一九一八年（布列斯特和約）爲了可否允許某種“妥協”的問題。

在一九〇八年，“左派”布爾塞維克黨人，被開除黨籍因爲他們剛愎固執地否認有參加反動國會之必要。那時左派的——他們中間很多出色的革命家，後來又成了共產黨底忠實黨員（現在還是）——最有力的論據，便是一九〇五年抵制國會的有效的經驗。當沙皇在一九〇五年八月宣布召集諮議式的“國會”時，布爾塞維克——反對各反對黨及孟塞維克派——曾聲明加以抵制，事實上一九〇五年十月革命已把該屆國會，一掃無餘。那時的抵制是對的。并非一般的講，不參加反動議會是對的；而是因爲看清了那時客觀的形勢，知道羣衆罷工將急轉直下，把經濟罷工，轉爲政治的罷工，最後必然進入暴動。此外，那時的鬥爭是爲着：立憲機關的召集，總沙皇把持呢，抑應設法從舊政府手中奪過來。但以後黨相同的具同樣方向和發展速度的客觀形勢已的確地沒有時，這種抵制便不能再認爲是對的了。

一九〇五年布爾塞維克黨之抵制“國會”，使革命的無產階級增加了一個很有價值的經驗。曉得在公開的與祕密的，議會內與議會外的爭鬥形式底聯結之下，有時拋却議會政策，不但有益，而且是無條件地必要的。但是盲目地依樣葫蘆地輕率地把這種經驗，搬到別種條件和情況之下，則是極大的錯誤。一九〇六年布爾塞維克黨底抵制國

會，已經是種錯誤，但是還小，容易改正（註）。至一九〇七年到一九〇八年以及以後的抵制，則是很嚴重很難改正的錯誤：因那時一方面既不能等待革命波濤很快的高漲，更無急轉為反動的希望；他方面，重新恢復的資產階級式專制帝國主義之整個歷史形式，使公開與秘密工作有聯結之必要。現在我們一回顧已經完成的整個歷史時期（他與以後各時期之連繫，已極明瞭），就非常明白地可以看到，假使布爾塞維克黨在最激烈的爭鬥中，不能保持聯合秘密的與公開的鬥爭形式之職責，不能負責參加最反動的國會，及受反動法律所限制的各種組織（如保險儲金會等），那麼他們在一九〇八——一九一四年間，就決不能保持無產階級革命黨的中堅，自然更說不到鞏固和發展。

（註）凡論及個人者——稍加修改——亦可適用於政策及政黨。聰明的人不在他不做錯事；這種人不會有過，將來也不會有。聰明的人在他能够不弄出嚴重的錯誤，而且懂得迅速地敏捷地加以糾正。

一九一八年不會弄到分裂，那時“左派”共產黨人只在黨內形成了特殊的派別，或“小組組織”，且為時不久；同時（一九一八）“左派”共產主義最出色的領袖如拉狄克（Radek）布哈林（Bucharin）等同志，更公開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他們以為布勒斯特和議（Brester Eriede）是不可容許的，於無產階級政黨有害的，是對於帝國主義者的妥協，事實上的確是同帝國主義者妥協，但在當時的情形之下，這個妥協是必要的。

現在我聽到對於我們在簽定布勒斯特和約時所取政策的攻擊，例如從“社會革命黨”方面來的，或蘭斯百雷（Lansbury）同志在和我談話時所說的話。他說：“我們英國職工會底領袖們說，如果布爾塞維克可以妥協，我們也自可以妥協”。我通常使用一個簡易通俗的比喻回答：請你設想，比如你底汽車被強盜攔住了，你交出了你底錢，護照，手槍，汽車，你因此才得幸免了強盜的愉快的招待，這無疑

是個妥協。“Do ut des”（“我給”你以金錢，武器汽車，“使你給”我以完全無恙地脫離虎口的可能）。但是很難找到一個并不瘋癲的人，說這樣妥協是“根本不容許”的，或者說，這個擅行妥協的人，是想同強盜打夥的（雖然強盜得了汽車武器以後，可用以打劫他人。我們和德國帝國主義的妥協，正和這樣的妥協類似。

但當俄國的孟塞維克派與“社會革命黨”，德國的率得曼之流（以及很多考茨基主義者）奧國的鮑宛爾與阿得來（更不用提普乃爾先生們）法國的李諾得 Renaudel 朗基們，以及英國的費邊派“獨立黨”“工黨”等，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一九一八——一九二〇年間，同他們自己的資產階級而且有時同“協約國的”那些資產階級強盜們妥協以反對本國革命的無產階級時，這些先生們底行動，實是強盜底共同犯。

結論已經白明了，‘原則上’反對妥協；不問妥協底性質如何而一概否認妥協之採用，這完全是兒戲，用不着鄭重視之。一個政治家，如願有利於革命的無產階級，就要能夠具體看到那種是不能容許的妥協，在這種妥協中，表現着機會主義與叛賣行動，因之便要用全部的批評力，要用全部無情地加以揭破和向之宣戰的銳氣，以反對這些具體的妥協；不許那老奸巨猾的“營業”社會主義者，議會主義的教徒，藉口“一般的妥協”而脫身卸責。英國的“職工會領袖”以及費邊社“獨立”工黨底先生們，正想用這個方法，以卸脫他們在叛賣行為上在這種妥協上負的責任。他們底妥協，實際是最卑劣的機會主義與叛賣階級的行動。

有各種不同的妥協。人們要懂得怎樣分析每個妥協與變相妥協底具體情形和條件。人們應該學習，怎曾把兩種人分別開來；一種以金錢兵器交給強盜，籍以減少強盜底凶惡行為，以便後來易於拘捕和槍斃強盜；他一種把金錢兵器奉獻強盜，希圖夥串分贓。不過在政治上，這點絕不會像在兒童的簡易例子中，那樣容易分析。如果有人異想

天開，以爲可以應造一個工作方案，能够預先解決實際生活上底一切事件；或是有人預說在革命無產階級的政策上，不會有什麼困難和複雜的情形，這個人便只是吹牛大家。

爲避免錯誤起見，很簡單的試拿幾個根本要點，來分析具體的妥協。

在簽定布勒斯特和約時與德國帝國主義妥協的政黨（即布爾塞維克黨）自一九一四年末以來，已在事實上充分鍛鍊出他的國際主義。他不怕鼓吹沙皇專制底失敗，他指斥雙方帝國主義強盜戰爭中的所謂“保護祖國”的主張。這黨底國會代表，不走向資產階級政府的總長高位以上去，而被流徙於西比利亞。打倒沙皇帝制建設民主共和國的革命，使這黨經過新的極大的試驗。黨絲毫不和“本國的”帝國主義者，作任何妥協，而只竭力準備把他們推倒並且已經加以實現。取得了政權後，這黨更沒收地主與資本家之財產，使之絲毫無遺。在公布而且破裂帝國主義底密約以後，黨在一切民族面前，建議和平。及至英法帝國主義者，破裂了和議，布爾塞維克黨在促進德國和其他國家的革命上，精疲力竭以後，不得已才屈服於布勒斯特強盜底暴力之下。這樣的黨，在這種情形下，締結了這個妥協。這個妥協之完全切當，在一般人看來，已經一天天地更明瞭和顯著了。

至於俄國孟塞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以及一九一四——二〇年間第二國際底全體領袖們，則直接的或間接的藉口於“保護祖國”即保護“本國的”掠奪別人的資產階級，以開始他們的叛賣行爲。他們更進而與自己國內的資產階級勾結和自己的資產階級在一起，向革命的無產階級進或他們最初勾結克斯命基與立憲民主黨。繼而勾結考爾察克 Koltshak 丹尼金 Denikin（二人俱爲國內戰爭時的白黨將軍），及其國外的黨徒；勾結各該國資產階級，終於投降資本階級與無產階級爲敵。他們和帝國主義強盜的妥協，只是自始至終要便強盜的幫手。

第五章 德國的“左派”共產主義

領袖——政黨——階級——羣衆。

我們現在說到的德國共產黨人，自命不曰“左派”，而稱爲——如果我未記錯的話——“原則上的反對派”，但是他們却全備有“左派幼稚病”的一切症候。這在下面便可以看得清楚：——

一本站在這個反對派觀點上在佛羅堡出版的小冊子（叫作“德國共產黨（斯巴達團）之分裂”），把反對派意見底實質，解釋得最爲顯著，真切，明瞭，簡短，我現在節引幾段，便可使讀者認識這種實質：

“共產黨是最堅決的階級鬥爭底政黨……

“……就政治方面看，這個過渡時期（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時期。

“……現在的問題是，誰應該是專政的負責者：共產黨呢？抑是無產階級？

“……原則上應努力實現共產黨底專政呢？抑是無產階級底專政呢？！！”

（引文中的點劃，均依照原文）

著者緊接着歸咎德國共產黨，“中央”，說中央企圖和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聯盟，說‘中央’之所以提出“原則上承認一切政治爭鬥手段的（包括參加國會）問題”，只是想掩飾他真實的最重要的要聯絡獨立黨的圖謀。

這小冊子接着說道：

“反對派另選他道。他以爲共產黨統治與政黨專政的問題，只是一個策略的問題；不論如何，共產黨的統治，總是政黨統治底最後形式。原則上應致力於無產階級的專政。所以黨底一切措施，黨底組織，鬥爭形式以及戰略術都須適合此點。因此與其他政黨之任何妥協，在歷史上政治上已經過期的議會主義鬥爭形式之回復，以及一切縱橫捭闔及妥協的政策，都應予以堅決之排斥。……特殊的無產階級的鬥爭方法，宜特別加以注重。爲萃集最廣大的無產階級羣衆，使在共產黨指導之下鬥爭起見，務須在最寬廣的基礎上，在宏大的範圍內，建立新的組織形式，這個一切革命分子之匯集地，便是根據生產組織而建設的“工人聯合會”。凡贊成“退出職工會！”口號的工人，都應聚集於此。這裏將使鬥爭中的無產階級，形成最廣大的富於戰鬥力的隊伍。只要承認階級鬥爭，承認蘇維埃制度，承認無產階級專政，便可加入，至於以後鬥爭的羣衆之政治訓練，鬥爭中的政治指導，則是站在工人聯合會以外的共產黨底任務。

“……因此現在便有兩個共產黨，相互對峙着；一個是領袖們底黨，企圖組織革命的鬥爭，從上面指揮這個鬥爭，採取妥協與議會政策，以造成一種局面，使他們可以加入混合內閣，把專政拿到混合內閣手中。另一個——羣衆底黨——從下面等待革命

鬥爭底高漲，他在鬥爭中，只知道而且只採用唯一明確的走向目的上去的方法，排斥一切議會主義的和機會主義的方法；這個唯一的方法，便是毫無顧忌地推翻資產階級，以建設無產者底專政，實現社會主義。……

“……那裏是領袖們專政——這裏是羣衆底專政！這就是我們的口號。”

這是德國共產黨內反對派觀點底最主要的綱領。每個布爾塞維克，只要曾經自覺地參加過或親切地觀察過一九〇三年以來布爾塞維克主義底發展的，遇到這種論調的時候，便立刻要說：“這是如何”陳腐已極的廢話！這是如何“左傾”“的幼稚病”！

我們試進一步觀察這種論調。

這樣發問：黨底專政或階級底專政？領袖的專政或羣衆底專政？已經證明他們非常的不可救藥的，思想的錯亂。這些人們要賣力想些特別東西，而其智慧的高明，却祇供人發噓。誰都曉得羣衆劃分爲階級——在羣衆和階級對舉的時候，一個只是表示極大多數的人民，並不區分他們在生產的社會地位，另一個却是指出在生產內佔有特殊社會地位的分類；在多數場合中，至少在現代文明的國家裏，階級普通爲政黨所領導。據一般的規例，政黨又經常的爲好幾個最負聲望最具威信，最有經驗，被選於負責地位的那些人所指導；這些人叫做領袖，這些都是初步常識，這些都是簡單而明顯。爲什麼還要來說這些夢話？這些詰屈聱牙的謎語？一方面，像是因爲黨底公開和祕密情形的迅速轉變，破壞了存在於領袖，黨以及階級中間的普遍，通常和簡單的關係，於是遂使他們張皇失措，進退維谷。本來在德國及歐洲其他國家，太習慣於公開生活，平素可以按期由黨的大會，自由地按章地選舉“領袖”，可以簡便地由議會的選舉及其他集會，出版，職工會和其他團體的情緒等等，檢閱各黨底階級成份。及至通常的情形一過，革命狂潮徒漲，國內戰爭廣佈，不得不從公開急趨於祕密以自

的並用；“領袖集體”的產生，不得不採用“不簡便的”“非民主的”方法，——即指派的，委任的或輝聯的方法。到了這時，他們遂大惑莫解，而想入非非了。大概荷蘭的“論壇派”，不幸生長在編小的國家內，平素享慣特殊優越和平安的公開地位之傳統與條件，從來不會嘗過公開秘密二種形勢轉變的滋味，於是自己便慌張和昏聩起來，而助成了這個荒唐無稽的臆想。

另一方面，顯然只是未經思索毫無聯貫地採用一些“領袖”呀，“羣衆”呀的“時髦”名詞。這些人大概時常聽到並且學會怎樣攻擊領袖，怎樣把他們和羣衆對峙。但是爲什麼要這樣做？實情究竟是怎樣？他們却莫明其妙而不能自解。

“領袖”和“羣衆”的脫離，在帝國主義大戰之末及戰後，特別明顯和刺目地表現於各國。這個現象之根本原因，馬克思與恩格思在一八五二年到一八九二年間，已由英國的例，反復地加以說明了。英國底壟斷地位，使從“羣衆”中劃出一部份中產階級的機會主義的“工人貴族”。工人貴族的領袖，時常轉投於資產階級方面，受資產階級的——直接的或間接的——蒙養。馬克思之所以能享受這般混蛋底榮譽的仇恨，便是在於他明白地指斥他們爲叛賊。近代的帝國主義（二十世紀的）爲無數先進國家創造了壟斷的優越的地位。在這個基礎之上，第二國際內部才遍地茁生各式叛賣階級的領袖，機會主義者，以及社會狹義愛國主義者，他們只顧自己屋內，自己工人貴族圈內的利益。機會主義的政黨，因此就逐漸脫離了“羣衆”，脫離了勞動羣衆中最廣大的一部分，脫離了它們中間的大多數，脫離了工資最低的工人。如果不同這個害物作戰，不揭破，排斥，驅逐這般機會主義的叛賣階級的領袖，革命無產階級的勝利，就不可能。第三國際即進行這種政策。

因此，普遍地把羣衆專政和領袖專政對列起來，乃是可嘆的昏聩和糊塗。尤可怪者，即在“打倒領袖”口號的掩飾之下，要以高談闊

自然的怪話之新領袖，來代替對於一般事物具有公認見解的舊領袖。這些新領袖，在德國是誰呢？便是勞芳伯（Lauffenberg）烏爾夫翰（Wolffheim）霍奈爾（Horner）史萊得（Karl Schroder）文得爾（Friedrich Wendel）愛爾雷（Karl Erler）（註）。

（註）共產主義工人報（漢堡，一九二〇年二月七日，第三十二號，愛爾雷著，黨之解散）上說：“工人階級不先消滅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便不能打破資產階級的國家。但不先打破政黨，必不能消滅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

改良派工黨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中間的頭腦昏亂的人們，可以自傲“吾道不派”了。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命的老成的德國人（登在上述報上的愛爾雷，霍奈爾兩人的文章，特別強烈地表現出，他們自以為是堅實的馬克思主義者，而却特別荒唐地胡說，顯示他們還未曾懂得馬克思主義底初步），也公然信口胡說到這個地步。可見僅僅承認馬克思主義，還不能免除錯誤。俄國人特別明白這點，因為馬克思主義在我們那裏，常是一種時髦。

愛爾雷對於這問題更要‘深入一層’，他的一般地宣布政黨之不需要與政黨之“資產階級化”，這真是荒謬已達絕頂，我們只有對之搖頭，聳肩。從此可以看出，如果固執錯誤，佞口，巧變，更幹，“到底”，那麼小錯可以弄成無比的大錯。

否認黨與黨紀律，——這就是反對派的要點，這就等於完全解除無產階級武裝，之效忠於資產階級。這正表現小資產階級的散漫，動搖，不能堅忍，不能團結，不能一致行動等等的習性。如果對之大度優容，必使任何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失敗無疑。從共產主義的觀點上看來。否認黨，即是要想從資本主義崩毀之前夜（在德國），一躍而至共產主義之最高階級（不是最低階級也不是中段）。我們在俄國（在推倒資產階級後之第三年），方才祇處於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即是到共產主義的最初階級）之第一步；階級仍舊存在着，即在無產

階級奪得政權以後，階級還要遍地長時期地存在。這個時期在英國或可縮短，因為那裏沒有農民（但仍有小有產者）。消滅階級（不僅是趕去了地主資本家便算完事，這個我們比較容易地做到了）就必須消滅小的商品生產者，但是對於這些小生產者，不能加以驅逐壓迫，而要和他們諒解，要用（而且必須用）長期的，逐漸的，謹慎的，組織的工作，去改造他們，教育他們。他們以小資產階級的浪漫性，從各方面包圍無產階級，加以浸潤和誘惑，不斷地在無產階級內部喚起小資產階級的輕佻，散漫，個人主義，由熱狂變成灰心等等習氣之復發。所以在無產階級政黨內部就必需有最嚴格的集中與紀律，以期抵制上述習氣，使無產階級底組織作用（這是他最主要的作用）能夠正確地有效地勝利地進行。無產階級專政，是一種艱苦的鬥爭，是流血的與不流血的，暴力的與和平的，軍事的與經濟的，教育的與行政的等等鬥爭，以反對舊社會的全部力量與傳統。數百萬，數千萬人的習慣的力量，——乃是一種最可怕的力量。如果沒有一個鐵的在鬥爭中鍛鍊出來的黨，沒有一個為無產階級內全體忠誠分子所信任的黨，沒有一個能注意羣衆情緒和影響羣衆情緒的黨，那末就絕對不能勝利地進行這個鬥爭。戰勝強大而集中的資產階級，較之“戰勝”數十百萬小有產者，容易千倍。小有產者，以其日常瑣碎的，不可捉摸的破壞的活動，實現資產階級所需要的，恢復資產階級的那種結果。誰要是一絲一毫的減弱無產階級政黨底鐵的紀律（特別在無產階級專政期間），誰就實際上幫助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

除領袖——政黨——階級——羣衆等等問題外，“反動的”工會的問題，也須跟着提出。最先讓我根據俄國的經驗說明幾個要點。對於“領袖專政”的攻擊，不斷在我們黨內發生過。我回想到一八九五年時，當形式上黨還未成立，彼得堡一個中央團體已經開始組成，而要起來指揮其他地方團體的時候，發生第一次的攻擊。在我們黨底第九次大會上（一九二〇年四月）發生一個小反對派，也聲說反對，“

領袖專政”“寡頭政治”等等。因此德國的“左派共產主義”的幼稚病，並不是什麼希奇的新鮮的可怕的事情。這是一種無傷機體的病，病好了之後機體甚至更要強健起來。另一方面，公開的和秘密的工作之急劇轉變，連帶的使“大本營”及領袖，更要“隱匿”，“密藏”。這種轉變，有時使我們中間發生十分危險的現象。最壞的，是在一九一二年；那時一個奸細名喚馬里惱夫斯基（Malinowski）的鑽入布爾塞維克黨中央委員會。他叛賣了很多很好的最忠實的同志，驅送他們去做苦工，夭折其中很多人的性命。他之所以不會種下更大的災禍，實賴我們把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的相互關係，佈置得適宜。馬里惱夫斯基身居中央委員和議會議員的地位，為獲得我們底信任起見，不得不設法替我們發行公開的日報。這個日報雖在沙皇下面，還能夠和孟塞維克黨底機會主義奮鬥，能夠婉轉地宣傳布爾塞維克主義的原理。馬里惱夫斯基一隻手流徼了殺害了整幾十個布爾塞維克底好領袖，別一隻手不得不幫我們發行公開報紙，訓練成千成萬新的布爾塞維克。負着要在反動的職工會內工作的任務之德國（同樣英國的，美國的，法國的，意大利的）同志，該黨再三思維這件事實。（註）

（註）馬里惱夫斯基大戰中被俘於德。他在布爾塞維克黨當政時返俄，立時提交法庭，被我們底工人槍決了。孟塞維克惡意地極力攻擊我們這個錯誤，因為我們讓一個奸細混進中央委員會來。但當我們要求克倫斯基逮捕國會議員羅薦科（Rodzianko）提交法庭審判時）因為他在戰前已曉得馬里惱夫斯基底奸細行動，而不報告國會中勞動黨人及其他工人）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不惟不贊助我們，而且反和克倫斯基狼狽為奸，使羅薦科逍遙法外，而投奔於丹尼金（十月革命後，反對蘇維埃政府的領袖）。

現時在許多國內，包括最先進的國家，資產階級無疑地派遣奸細

，往共產黨內搗亂（並且將來必繼續派遣）。和這種危險奮鬥的一個方法，便在善於聯結公開和祕密之工作。

第六章 革命黨人應否在反動的職工會內工作？

德國‘左派’對此問題已是無條件地決定作否認的回答。他們以為用幾篇演講和怒氣沖沖的宣言，去反對“反動的”“反革命的”職工會（特別“堅實”特別昏聩的要推霍奈爾）便足證明革命黨共產黨人不僅不需要，並且不容許在黃色的社會狹義愛國主義的，妥協的，“列金式”的（列金乃以前黃色職工國際的領袖），反革命的職工會中工作。

不論德國“左派”怎樣相信他們底策略是革命的，但實際上，是根本錯誤的；這種策略，除空話外，毫無內容。

為說明這點起見，我根據本文的計劃，從我們俄國底經驗說起——本文底目的即在把布爾塞維克主義歷史中和現在策略上可以普遍採用，具有普遍意義，應該普遍實行的要點，應用於西歐。

領袖——政黨——階級——羣衆間底相互關係以及無產階級專政及無產階級政黨對於職工會的關係在蘇俄現在具體的表現如下：組織

在蘇維埃中的無產階級實現了專政。這無產階級由布爾塞維克共產黨引導。這黨據最近黨大會（一九二〇年四月）報告共有黨員凡六十一萬一千人。在十月革命以前和以後，黨員數目變動很大以前甚至直到一九一八和一九一九年時，黨員的數目都少得多。我們時常顧慮黨底過度發達，因為想升官發財的狡猾無恥之徒，一定會乘機攀緣當權的黨。這些人自然只值得槍斃。當一九一九年冬猶登尼赤（Judenitsch）逼近彼得堡，丹尼金（Denekin）已抵歐萊爾（Orel距莫斯科僅三百五十俄里），蘇維埃共和國真是如臨危崖，生死未卜。這時，一般冒險鬻利投機之徒，一切畏首畏尾的人們，自然決不會把共產黨看作討便宜的捷徑（儘可等候着絞架和 梏），祇在這個時候我們才大開黨門——但也僅僅爲工人農民。黨每年召集黨代表大會（末次係一九二〇年三月八日至二十三日），每個代表代表一千同志，在黨大會上選舉十九人，組織中央委員會，指導全黨。在莫斯科的日常工作由更狹窄的機關——組織部與政治部——主持，這兩部統由中央委員會會議選出，各以五人組成。在這裏可以說是真正的“寡頭政治”。未經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指示，任何國家機關，不能解決重要的政治或組織的問題。

在工作中，黨直接依據於職工會之上，據職工會末次大會報告（一九二〇年四月）工會會員，在四百萬人以上，就形式上說來，牠是非黨的。實際上，大多數職工會的全體指導機關——首先自然是全俄職工會中央委員會——多由共產黨人組成，實現黨底一切指令。這樣，總起來講，職工會是一個形式上非共產黨的，深入的，比較廣大的，異常有力的，無產階級的機關；經過牠，黨得與階級和羣衆密接，經過牠並且在黨的指導下，階級專政始得實現。倘不與職工會親密聯接，倘在經濟建設上尤其是在軍事建設上，沒有牠們熱烈的幫助，沒有牠們犧牲的工作，那麼我們不要說兩年半，便連兩月半也總治不了我們的國家。自然，這種親密的聯接實際上是極繁重複雜的工作：

宣傳，煽動，和應時的不斷的會議（不僅與職工會中領導者，而且更要與一般的能幹的職工會工作者集會）；牠更是極堅決的反對孟塞維克的鬥爭。孟塞維克在工會中直到現在（一九二〇年四月時），還有少數的擁護者，牠們被擁護者以各種可能的反革命的行動，從思想上擁護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宣傳職工會“獨立”起（離開無產階級政權的獨立！）一直到漫視和破壞無產階級的紀律為止。

單是經過職工會去聯接羣衆，我們還覺不夠。在革命過程中，實際工作，給我們產生了一種新的結合，即是無黨派的工農會議。我們對於這種會議應該用各種方法去幫助，發展和擴大，——進去考察羣衆情緒，接近他們，解答他們的問題，從他們中間，為政府機關選擇得力的工作人材等等。在最近改國家監督人民委員會為“工農監察會”的訓令中，曾給與這類非黨的會議以選舉國家監督部部員來作各種檢查的權利。

其次，黨底全部工作的進行，自然要經過包含不分職業的一切勞動者之蘇維埃。像各縣蘇維埃會議這樣民主化的制度，就在最進步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內，也決不會夢見過。經過這種會議（對於這種會議，黨是注以全部精神的），並經過由黨特別派往鄉村擔任各項職務的階級覺悟的工人，無產階級就形成對於農民之領導作用，城市無產階級之專政，有系統地反對資本主義剝削的投機富農之鬥爭等等，也都因之實現了。

從實現專政的實際上看來，無產階級政權“從上而下”的結構，就是如此。希望讀者由此可以明白，為什麼認識過以及如觀察過這個結構的俄國布爾塞維克——他們看着這個結構怎樣在二十五年中從秘密的地下的小組織發展起來；為甚麼他們不能不把自“上”，或自“下”，領袖專政或羣衆專政等等的謔言，看做可笑的兒戲的鬼話，看作好象評判人的左腿和右手，那個有益些這類的爭論。

同樣，德國“左派”鄭重的，異常飽學的，十分革命的闊論，說

甚麼共產黨人不能並且不該在反動的職工會中工作，說他們可以放棄那項工作，退出職工會，應該另外創設一個簇新的清一色的，由特別可愛的（大部恐怕是特別年輕的）共產黨人臆想出來的“工人聯合會”等等，也同樣不能不看作是可噁的兒戲的笑話。

資本主義所不可避免地要遺留給社會主義的是：（一）工人中間舊的，經歷數百年的職業和手藝上的區別。（二），職工會；這職工會很遲緩地經過了無數年月，才往前發展成規模較大行會氣味較少的生產組合（牠所包含的不僅是同行，同一手藝和同一職業，而且是整個生產），然後經過這些生產組合，逐漸消滅人與人中間的分工，施行教育，訓練，預備，使人人都有各方面的智識，各方面的訓練，做得一切事情。共產主義正是向這個方面走的，他必須向這個方向走，並且定能達到這點；但是一定要經過長久的年月。現在便想把將來充分發展的，充分鞏固的，充分完成的，十分進化的，成熟的共產主義之成效，拿來享用，這正等於想使四歲的小姑娘，熟諳高等數學。

我們不能（也不應該）從玄想的，由我們特別定製的人間材料，而是要從資本主義留給我們的材料，去着手建設社會主義，這無疑地是很‘困難的’。不過除此以外，對於這種任務的任何其他的解決辦法，都太不鄭重，不值得討論。

當資本主義開始發展時，職工會已表現出是工人階級由孤立無援的一團散沙過渡到初步階級團結上之巨大進步。當無產階級聯合的最高形式，革命的無產階級底政黨（要是政黨不會把領袖，階級和羣衆融而爲一，使之不可分離，便不配這個名字）逐漸興發來時，職工會自然免不了暴露一些反動的表徵，暴露多少行會的狹隘性，多少非政治的傾向（非政治主義），多少保守主義等等。但是無產階級在這個世界上，除了經過職工會，除了經過職工會與工人階級政黨間的相互影響外，再無處可以發展，並且也不能發展。無產階級之奪取政權，是他階級力量上的偉大進步。黨在這時，須更加用力，應用新的——

不僅用舊的——方法，去訓練和指導職工會；但同時不要忘記職工會現在是并將來長時期內還要是一個必要的“共產主義底學校”，是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預備學校，更是工人的必要集合，使全國經濟的管理，得以永久轉到工人階級（而非各個職業）的手中，再後轉到全體勞動者的手中。

上述職工會底一些“反動表徵”，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是免不掉的。誰要是不懂這點，誰便暴露了他對於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根本條件，一竅不通。害怕這些‘反對的表徵’，因而想避開他，跳過他，實是愚不可及，因為這就是害怕無產階級先鋒底作用；這作用正是在訓練，啓發，教育，引導工人階級反農民之落後分子與落後羣衆。另一方面，倘以爲應該拖延無產階級專政底實現，直至工會狹隘心理的工人，懷抱行會的，工會的成見的工人，一個都沒有的時候，那末這更是大錯特錯。政治家底藝術（以反共產黨人對於任務之正確了解），恰在能認清條件與時機，使無產階級先鋒隊得以勝利地奪得政權；且能在當時以及事後，得到最大部分工人階級及非無產階級勞動羣衆底充分贊助；進而教育訓練引導更廣大的勞動羣衆，以保持鞏固和擴大他的政權。

復次，在那些比較俄國進步的國家內，職工會的某些反動性，無疑地要表現得並且一定要表現得比俄國更爲有力。在我們這裏孟塞維克黨從前之所以能够盤據職工會（現在他們是很少數的工會內還有一部分力量），正因爲他們利用工會之行會的狹隘心理，工會的自私自利性和機會主義。西歐的孟塞維克，更加根深蒂固地，“盤據”於職工會中，結成了一大羣工會的狹隘的虛榮的自利的頑固的貪婪的市儈的，贊助帝國主義的，以及爲帝國主義所收買的，昏狂的，‘工人貴族’；他們比俄國的孟塞維克，更要厲害，這是無疑的。同郭朋司（Gompers），庶敦（Jouhaux），亨得孫（Hendeison），麥麥姆（Merrheim），勒金之徒的鬥爭，比較同我們這裏和孟塞維克的鬥爭

更艱難得多。他們本來都是一丘之貉，本是同一社會的政治的模型，應該無情地進行這種鬥爭，像我們這樣地把牠貫徹到底；直至完全揭破他們底無恥完全把機會主義的社會狹義愛國主義的一切不可救藥的領袖們驅出工會為止。如果這場鬥爭，不會進行到一定的程度，奪取政權是無望的（也不該想去奪取）；而這個“一定的程度”在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條件下，是不相同的。正確地判定這個程度，只有各個國家內無產階級底深謀遠慮經驗豐富的政治指導者才能勝任（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舊曆〕俄國無產階級革命成功幾天以後之十一月立法會議選舉，可以作為這個爭鬥上勝利的測量器。在這次選舉中，孟塞維克黨受致命的打擊，僅獲得七十萬票——連高加索一帶共一百四十萬——贊成布爾塞維克黨的有九百萬票〔參看我底論文：立法會議與無產階級專政，共產國際第七，八兩號，〕）（列寧全集第十六冊）。

但是，我們以工人羣衆的名義向‘工人貴族’鬥爭，為的是要吸收工人羣衆走向我們這邊來；我們向機會主義的狹隘愛國主義的領袖們鬥爭，為的是要吸引工人階級走向我們這邊來。如果忘記了這個明顯的基本真理，便是瘋狂。而‘左派’德國共產黨人恰犯了這個瘋狂症。他們因為工會上層份子的反動和反革命，便是進出工會！！拒絕工會工作！！建造新的臆想的工人組織底形式！！這真是不可寬宥的愚蠢等於共產黨人為資產階級鞠躬盡瘁地效勞。要知我們那裏的孟塞維克，以及職工會內一切機會主義的，社會狹義帝國主義的，考茨基派的領袖，統統是“工人運動中資產階級底走狗”（我們常常這樣地斷定孟塞維克）他們統統是‘資產階級底工人僕從’（Labor Jieutenants of the capitalist class，借用美國德國尼耳，立歐 Damele de Leone 派最確切的成語）。不在反動的工會內工作，就是把不十分覺悟的，或落後的工人羣衆，委棄於反動領袖的勢力之下，委棄於資產階級走狗，工人貴族，或“資產階級化了的”高等工人底勢力之

下（參看恩格思一八五二年給馬克思論英國工人的信）。

恰是共產黨人不參加反動職工會的愚蠢的“理論”，最顯明地證明‘左派’共產黨人如何輕浮地應付影響羣衆的問題，這樣地滿口濫唱“羣衆”的高詞。爲使我們能够幫助，‘羣衆’轉以獲得他們的同情，景從和資助起見，便不應該害怕困難，便不應該害怕那些“領袖們”底殘毒，誣詐，侮辱，和陷害（事實上，這些機會主義者社會狹義愛國主義者，大多數是直接地或間接地與資產階級與警察勾結的）。只要那裏有羣衆，便應該進去作工，應該能够作任何的犧牲，排除最大的障礙，有係統地，不屈不撓地，堅毅地，忍耐地在一切機關，社會，團體內宣傳，煽動；只要那裏有無產階級及半無產階級羣衆，不管這些組織反動到萬分，我們都應該進去做工，而職工會與工人協作社，正是（後者雖不多是，但多少總常是）羣衆薈萃的組織。瑞士國民政治日報（Folkets Dagen Politiken）揭載（一九一九年三月十日，英國職工會會員，從一九一七年末到一九一八年末，由五百五十萬增至六百六十萬，即增加百分之十九。至一九一九年末，會員數目已達七百五十萬。我手頭沒有德法二國的同類材料，但一般確鑿的事實，決定這兩國的工會會員都有大量的增加。

這些事實，說明下面情形，并經千百其他現象，加以證實：即在無產階級羣衆中，‘下層羣衆’中，‘落後羣衆’中，覺悟和組織的要求，特別厲害。英法德數十百萬工人第一次從一盤散沙，過渡到初步的低級的最簡單的最易接近的（這是就還被資產階級民主的成見所蒙蔽的人們來說）組織形式，即過渡到職工會，而革命的但愚蠢的左派共產黨人，却袖手旁觀，高呼‘羣衆’！‘羣衆’！——而反對在職工會內作工！！藉口職工會的‘反動性’，排斥這項工作！！臆想一個純粹的新的“工人聯合會”，一個沒有資產階級民主成見底，不染行會的狹隘工會的一切罪孽底‘工人聯合會’，這聯合會將要（將要！）成爲廣大的工人組織；他們更提出僅僅（僅僅！）承認“蘇維

埃及權與專政”爲入會條件（參看前面引文）！！

比“左派”共產黨人更蠢，危害革命更甚的，再找不到了。假使我們現時在俄國，在空前地戰勝俄國及協約國資產階級已達兩年半以後，提出“承認專政”爲加入工會條件，那末簡直是蠢到萬分，簡直是破壞自己在羣衆中之影響，無異於幫助了孟塞維克。因爲共產黨人底全部任務，是在於能使落後羣衆信服，能在落後羣衆中工作，並不是在於臆想的兒戲的‘在派’口號，令自己與羣衆離開。

無疑地，郭朋司，亨得孫，庶敖，勒金那些先生們，一定會厚謝這些‘左派’革命黨人，——像德國的“原則的反對派”（可望保佑我們，脫離這樣的‘原則’！），或美國的‘世界產業工人會’（I. W. W.）中的一些革命黨人——厚謝這些高唱退出工會拒絕工會工作的革命黨人。無疑地，機會主義底領袖先生們將儘量憑藉資產階級底外交手腕，將仗仗資產階級政府牧師警察法庭底幫助，攔阻共產黨人進入工會；用盡方法排擠，侮辱，攻擊，危害共產黨人，使其在工會中的工作苦痛萬分。但是我們要懂得抵禦一切，決心忍受任何犧牲，甚至（倘需要的話）遇以詭變，應以機智，隱忍諱匿，不以真面目相示，以期浸入工會，存身其中，不顧一切困難，以進行共產主義之工作。在沙皇政府下，直至一九〇五年，我們氣絲毫“公開的可能”。但當政府憲兵司令蘇巴托夫（Subatow）組織流氓式之工人集會，以圖搜捕革命黨人時，我們尚且派遣同志，前往工作（我自己還記得其中有巴布什金 Babuschkin 同志，他是彼得堡一個出色的工人，在一九〇六年，因此被俄皇軍官槍害）；他們便在那裏聯絡羣衆，懂得怎樣去煽動，使工人脫離蘇巴托夫之影響（註）。自然在西歐，因公開的立憲的資產階級民主的成見根深蒂固，此項工作，進行更難。但這項工作，是能够而且必須有系統地進行的。

（註）郭朋司，亨得孫，庶敖，勒金之徒與蘇巴托夫毫無二致；不同的地方，僅在他們實行無恥的政策時，穿着歐洲的服裝

，表示歐洲的圓滑態度，採用文明細膩的望着民主脂粉的方法罷了。

據我底意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必須直接指斥不參加“反動職工會”之錯誤，并當建議下屆國際代表大會予以裁處（詳細說明此種不參加之不明事理，對於無產階級革命之危害之大）；特別應指斥荷蘭‘論壇派’助長此種錯誤政策之態度——不管他是直接的或間接的，明目的或暗地的。整個的或部份的。第三國際的策略，應當決然的與第二國際劃開，對於癥結的問題，不該敷衍，不該粉飾，要赤裸裸的提出來，我們對於‘獨立黨人’（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已經劈面地告訴他們以全部的真理，現在對於“左派”共產黨人也應該劈面地告訴他們以全部的真理。

第七章 應該參加資產階級 的議會麼？

德國“左派”共產黨人再輕蔑沒有地——而且再輕浮沒有地對於這問題，作否認的答覆。他們底論據怎樣呢？我們已在上引文中讀過了。“……在歷史上政治上已經過期的議會主義鬥爭形式之重新採用，應予以堅決的排斥……”

真狂妄的好笑。謬誤的刺目。‘重新採用’議會政策——難道德國已竟成了蘇維埃共和國了嗎？似乎還沒有絲毫端倪，那末，怎樣能說到‘重新採用’呢？不是句空話麼？

議會政策是“歷史上過期的”了。在宣傳底意義上，這是對的。但是誰都曉得，從宣傳到實現，還相離得很遠很遠。在幾十年前，已很可理直氣壯地說，資本主義是“歷史上過期的”了；但是這樣仍是絲毫不能免除在資本主義下長期堅苦鬥爭之必要。就世界歷史的意義上講來，議會主義已經“歷史上過期”了，即是說，資產階級議會主義

底時期已經告終，無產階級專政已經開始，這是毫無疑義的。不過世界歷史的尺度，以數十年計，遲早十年或二十年，在世界歷史的尺度上，無關輕重，從世界歷史的觀點上看來，這只是不能估計的瑣屑小事。現在竟將世界歷史的尺度，援用到實際政策問題上去，這種理論的錯誤，真是莫可言喻。

議會政策已經“在政治上過期”了麼？這是另一問題。如果是對的，那末“左派”便佔住一個堅固的陣地。這點應該用最嚴密的分析去證明，但“左派”並不曉得分析。在共產國際亞姆斯特達姆臨時中央局公報第一號上，載有議會政策綱要，顯然是荷蘭“左派”底意見，這種分析，我們即刻可以看出是太不行了。

第一：誰都曉得在一九一九年春，德國“左派”已經認為議會政策在“政治上過期”了，這種意見完全與超羣絕倫的政治領袖如盧森堡，李卜克內西等底見解相反。誰也曉得“左派”是錯誤的了。祇這一點，已根本推翻了議會政策，：“在政治上過期”的這種綱領。“左派”應該證明爲甚麼那時他們所鑄成的鐵案的錯誤，現在忽然不復成爲錯誤。他們絲毫不能加以證明，本來也就不能證明。一個政黨對於本身錯誤的態度，是該政黨威信底最重要最可靠的標識之一，是該政黨是否對於此階級對於勞動羣衆確能履行任務的標識之一。明白地承認錯誤，並追尋其原因，透澈地分析產生錯誤的環境，細心地討論消除錯誤方法；這些都是一個莊嚴的政黨底標幟，是牠能够履行任務的證明，是他對於階級以及羣衆的教育和教訓。德國的（J以及荷蘭的）“左派”不能履此任務，不能用極端的注意，細心，審慎態度，去研究自己彰明較著的錯誤。即此已證明他們不是階級底政黨，而祇是一個小集團，不是羣衆底政黨，而只是知識份子和重蹈知識份子覆轍的一小部份工人底結合。

第二：在佛郎堡“左派”小集團所出版的小冊子中，除了上面已經詳細摘引的話以外，我們還可讀到。

“……依舊跟隨着中央黨（天主教‘中央黨’）政策走的數百萬工人，是反革命的。鄉村無產者已都組成了反革命軍隊的大隊”（原書第三頁）。

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這幾句話說的太飛揚太過火了，但這裏所陳述的根本事實，是確鑿的；‘左派’既承認這段事實，便更暴露了他們底錯誤。既然“數百萬”“大隊”的無產者，不僅普遍的贊成議會政策，而且簡直是反革命的，怎能說議會政策已經‘政治上過期’了呢？！可見在德國，議會政策在政治上還未過期。可見德國‘左派’硬把自己的希望，硬把自己對於本問題的思想政治上態度，當做了客觀事實，這對於革命家是最危險的錯誤。在俄國，沙皇帝制的異常野蠻殘暴的壓迫，長時期地，並且在各種形式中，產生了各種派別底革命家。他們真是敢於犧牲，熱烈，英勇，堅毅，令人景仰的革命家——在俄國，革命家的這類錯誤，我們特別親近地觀察過，特別注意地研究過，特別知道得明白，所以別人犯了，我們也看得最清楚。議會政策，對於德國共產黨人，自然是“政治上已經過期”了。不過我們應該曉得，對於我們過了期的，不能看作對於階級也過了期，對於羣衆也過了期。從此也可看出‘左派’不知判斷事理，不知以階級底政黨以羣衆底政黨自處。你們不應該自己降低到羣衆底水平線上，不能降低到階級落後部份底水平線上，這是毫無意義的，你們應該把苦味的真理告訴他們，你們應該指出他們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議會政策的成見。但是同時你們也應該；冷靜地認清整個階級的（不僅是共產主義先鋒的）勞動羣衆全體的（不僅是先進人們的）覺悟與準備底真實狀況。

即或不是“數百萬”“大隊”，而僅僅只有少數（數目還很巨大的）產業工人跟隨着基督教神甫，少數鄉村工人跟隨着地主富農，也就無疑地說明了議會政策在德國政治上還未過期；參加議會選舉，參加議會鬥爭，正是革命無產階級底政黨為教育本階級落後部分，為啓

發尙未覺悟的落後的和鄉村中黑暗的羣衆所無條件必需的。你們便一天不能打破資產階級的議會和其他形式的反動機關，你們便一天應該在這些機關內工作，正因為那裏還有被神甫及鄉村舊習所愚弄的工人；不然，你們便簡直是大言不漸的清談家。

第三；“左派”共產黨人對於我們布爾塞維克黨人，說了好些好話。有時禁不住要說。你們何不少恭維我們幾句，多研究多認識些布爾塞維克的策略；我們參加了俄國資產階級議會底選舉，參加了一九一七年九月到十一月的立法會議底選舉。我們底策略是對的呢還是錯的？錯的便該明白指出來，證明我們底錯處，這是規定國際共產主義的正確策略上所必需的；如果是對的，便該從這裏得出一定的結論。自然，不能說俄國的狀況與西歐的狀況相等；但是“議會政策在政治上已經過期”的這句話，究具何種概念？對於這個問題，特別應該詳細地估計我們底經驗，因為這類概念不經過一番具體經驗的估計，很容易變成空話。在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一月，我們俄國布爾塞維克不是比西歐任何共產黨人更有權利可以說議會政策在俄國政治上已經過了期麼？自然我們有權可以這樣說，因為問題不在資產階級議會存在多久，而在廣大勞苦羣衆，對於接受蘇維埃制度，對於驅逐或允許驅逐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議會的準備（思想上，政治上，實際上），達到何等程度。俄國當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一月之際，因為種種特殊情形，城市工人階級，兵士，農民，已經高度地準備妥當去承認蘇維埃政權，驅逐民主主義的資產階級議會，這是無可辯難的確鑿的歷史事實。然而布爾塞維克黨人不惟不曾抵制立法會議，而且還在奪取政權前奪取政權後號召無產階級參加選舉。至於參加選舉之大收政治成效（對於無產階級有益的），我希望，我在上文分析俄國立法會議選舉結果時，已經詳細加以證明了。

由此可以得到完全無可辯難的結論：證明即令在蘇維埃共和國勝利之前幾星期，甚至在勝利之後，參加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議會，不但

無害於革命的無產階級，而且可以用來向落後的羣衆證明，爲甚麼此種議會必須趕散，使他們幫助着來趕散，使資產階級的議會主義，在政治上更易消除。如果不考慮這種經驗，而同時却希望加入那應當製定國際策略的（不是狹隘的單純民族的，而是國際的策略）共產國際，那正是犯了極大的錯誤，正是口頭上承認國際主義，事實上與之背道而馳。

我們現在觀察一番荷蘭‘左派’不參加議會底論據。上面說到的荷蘭派的‘綱領’中最主要的條文——第四條——如下

“當資本主義的生產制度已經崩毀，社會進入革命狀態中，則議會活動與羣衆行動的本身相較，便漸漸失去了意義。那時在這種情況之下，議會便成了反革命底中樞，成了反革命的機關；而另一方面，工人階級在蘇維埃的形式之下建設他的政權底工具，——拒絕議會之任何之活動，也就簡直成爲必要的了”。

第一句話明顯地是錯誤的，因爲羣衆行動——例如大罷工——無論何時，都比議會的活動來得重要，不只在革命期間與革命的情勢中是如此。這樣不值一駁的在歷史上政治上統統錯誤的論據，充分說明作者全未顧到全部歐洲的經驗（法國一八四八年及一八七〇年的革命和德國一八七八年到一八九〇年間的經驗），也未顧到俄國的經驗（參看上文），即關於聯結公開鬥爭和祕密鬥爭之重要的經驗；這個問題，一般的講，特別的講，都是非常重要；因爲在一切文明先進的國家內，迅速地將成熟下述一種局面：即因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間內戰之成長與逼近，共和的以及一般資產階級的政府對於共產黨人之狂暴摧殘，一切合法可能的消滅（只看美國的例子！）等等，將使公開鬥爭與祕密鬥爭之聯結，一天一天成爲無產階級政黨底必修課（現在已有一部分是如此的了）。這樣異常重要的問題，荷蘭人和其他各國的‘左派’却絲毫不懂。

第二句話，就歷史上說來便先是錯的。我們布爾塞維克黨人曾經

參加最反革命的議會，在第一次資產階級革命（一八〇五年）後，準備第二次資產階級革命（一九一七年二月），接着準備社會主義革命（一九一七年十月至十一月）的期間，經驗告訴我們，這種參加，對於革命無產階級的政黨，非但是有益的，並且是必需的。其次，這句話可驚地違反邏輯。因為議會成了反革命底機關和中樞（附帶說明一句，事實上，議會並未成為反革命底中樞，同時也永不會成為反革命底中樞），而工人建設蘇維埃形式的政權工具；所以由此應得到下面結論：即工人必須在思想上，政治上，技術上準備起來，以作建立蘇維埃反對派，並進而用蘇維埃以趕散議會的鬥爭。但從這上面，絕不能得到結論說因為反革命的議會內部有蘇維埃反對派的存在，於是趕散議會反因而加難或更不容易。

當我們同丹尼金，考爾察克鬥爭的時候，從來不會看到在他們裏面存在的無產階級反對派和蘇維埃反對派，與我們底勝利沒有關係。

我們很曉得，當我們一九一八年一月五日趕散立法會議的時候，正因為反革命的立法會議中，站在蘇維埃方面的有了一個澈底的布爾塞維克的反對派和一個不澈底的反對派（左派社會革命黨反對派），所以工作不但不會加難，反而容易了許多。這個綱領的著者，真昏聩極了，縱然不說他們把一切革命的經驗忘記了，也要說他忘記了無數革命的經驗。這些革命證明，在革命期間，反動議會以外的羣衆行動，如能與議會內同情於革命的（直接贊助革命的更好）反對派聯合一致，那是怎樣的有益。荷蘭與其他各國的‘左派’在這裏的判斷，表示他們只是革命清談家，決不會參加過真正的革命，研究過革命史；一味表現幼稚態度，以為主觀的‘否認’某個反動機關，便算實際上用無數客觀因素底總力把他破壞了一般；毀謗一種新政治思想（不僅是政治的）最正確的方法，便是表面擁護他而實際把他弄成荒誕不經。因為任何真理，如說的‘過火’，大吹特吹，超出了他實在應用的

限度以外，便會弄成荒誕不經，而且非荒誕不經不可。荷蘭及德國‘左派’，對於蘇維埃政權超越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議會這個新真理的効勞，便是這種笨伯的行爲。自然，誰要是照舊的一般的說，在任何條件下，都不應該拒絕參加資產階級議會，那末也不是對的。在這裏我不能嚴格指定，在那些條件下抵制是有益的；因爲本文任務無他，只要估計俄國經驗與國際共產主義策略中一些切身問題之連繫，俄國經驗指示我們，布爾塞維克黨人應用抵制策略，一次是有効的對的（一九〇五年），一次是錯的（一九〇六年）。試一分析第一次情形，便看到：那次抵制，使反動政府召集不成反動會議，而且當時的情形是：議會以外的（特別是罷工的）羣衆革命行動興發異常之快，無產階級與農民中並無一部分贊助反動政府，革命的無產階級，已由罷工與農民運動担保他在廣大落後羣衆中的影響。很明顯的，這個經驗不適用於目下歐洲的情形，同樣十分明白的——根據上述理由——荷蘭及其他各國‘左派’對於拒絕參加議會的主張之擁護（雖說這個擁護是有條件的）是根本錯誤，大有害於革命無產階級底事業。

在西歐與美國，工人階級中最先進的革命家特別厭惡議會，這是無庸爭辯的。這也很容易明白，因爲在戰爭期間和戰後，要比議會中最大多數社會黨及社會民主黨議員更卑污更無賴更險惡的，實難再想像得出。但是在解決怎樣消除公認禍害的問題上，倘屈服於深惡議會之情緒下，那末不惟愚駭而且罪過。近來在西歐多數國家內，望斷愁腸之革命情緒，繳揚澎湃，實可謂‘罕見希聞’，或許因此就使他們這樣易爲感情所屈。自然，沒有羣衆革命的情緒，沒有促進這種情緒高漲的條件，革命的策略，無由見於事實；但我們在俄國受了長期堅苦流血的經驗，確信革命策略不許僅僅建築於革命情緒之上。策略之確定，須根據本國（以及鄰國，和世界上一切其他各國）各階級力量之清楚而嚴格客觀的估計，以及各國革命運動經驗之估計。僅僅呢罵議會政策的機會主義，排斥參加議會，以自標其‘革命精神’，實

覺太易，惟其太易，所以不能解決困難問題，更不能解決最困難的問題。在歐洲會議內，建立真正革命的議會黨團——比在俄國難的多，這是真的，但祇是全部真理上特別一方面之表現。這個真理，就在一九一七年歷史上非常特異之具體形勢，使俄國發動社會主義革命較易，然廣續之，完成之，則較歐洲各國為難。一九一八年初，我已指明這種情形，接着兩年來的經驗已完全證明此種分析是正確的。俄國革命的特殊條件，是：（一）有這種可能，可以把蘇維埃的革命與摧殘工農盡致的帝國主義大戰之終止（因這個革命，戰爭才能終止）聯合起來，（二）有這種可能，可以在某個時期內，利用兩個强有力的帝國主義大盜間之拚命的鬥爭，他們因之就不能協同進攻他們底蘇維埃敵人；（三）有這種可能，可以支持較久的內戰，這上面一部份是因為地域遼闊，交通阻滯的關係；（四）在農民中，有這樣深入的資產階級民主的革命運動，使無產階級政黨在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以後，可以取得農民黨（即社會革命黨，該黨大多數是反對布爾塞維克主義的）底革命要求，而立刻加以實現；——這些特殊條件目下在歐洲沒有，他們或類似他們條件之重演，不是很容易的事。這就是為什麼（除開一些別的原因不講）發動社會主義革命，在西歐比我們困難。欲‘略過’這種困難，‘跳越’那種為革命目的而利用反動議會之難事，那實是十足的兒童行爲。你們要建設新社會，但在反動議會內，由堅決忠實勇敢的共產黨人建設一個好的議會黨團，你們却怕難！這不是兒童行爲麼？德國李卜克內西，瑞典海各倫（Hoglund），並無下面羣衆贊助，而能給我們以真正革命地利用反動議會之模範，難道一個迅速向前發長的革命羣衆政黨，處在戰後羣衆失望悲憤的境況之下，反不能在最惡劣的議會內，鍛鍊一個共產黨的黨團嗎？正是因為西歐工人落後羣衆，尤其是小農落後羣衆，浸淫濡染於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及議會主義的成見，較俄國為甚；所以祇在資產階級議會那樣機關的內部，共產黨人方能（並且應該）施行長期的堅忍的百折不回

的鬥爭，以揭發掃蕩和克服此種成見。

德國‘左派’，因抱怨黨內的壞‘領袖’，便陷入失望中而噴出可笑地‘否認’‘領袖’的那些話來，但在‘領袖’們常須隱藏的條件下，要造出可靠，老練，和負有聲望的好‘領袖’，特別困難；所以要戰勝此種困難，沒有公開與祕密工作之聯結，沒有‘領袖’的鍛鍊（黨中並且要在議會內）是不可能的。批評——而且要嚴厲最無情最堅決的批評——不應該用來反對會議政策或議會的活動，而應該用來反對那些不知以革命方法以共產主義方法利用議會選舉利用議會演台的領袖，更應該用來反對那些不願利用議會選舉議會演台的人們。只有這樣的批評，以及無用領袖的驅逐，幹才的接替，方可使革命工作奏效，一方面訓練‘領袖’，使他們不愧為工人階級與勞動羣衆的領袖，他方面訓練羣衆，使之能在政治環境中，作正確的分析，而領袖從這環境中產出來的，常時非常複雜綜錯的那些問題。（註）

（註）我很少機會去認識意大利的‘左派’共產主義，但保爾底加（Bordiga）同志及其‘共產黨人抵制派’（Communistastensionista）的小組織，爲不參加議會的主張辯護，是錯誤的。據我所得的材料——他出版的兩期蘇維埃報（一九二〇年，第三，四號）匹期賽拉提（Serrati）同志底出色的共產主義雜誌（Comunismo 第一期至第四期，一九一九〇），以及幾份意大利資產階級的報紙——看來，我以為他有一點是對的。這點就是保爾底加同志及其小集團，對於屠拉弟（Turati）與其友人的攻擊；因爲屠拉弟等既置身在一個承認蘇維埃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政黨裏，既做着國會議員，而又繼續他們最有害的機會主義的老政策。賽拉提同志及整個意大利社會黨坐視容忍，這自然是一個大錯；這種錯誤，將使他要忍受和匈牙利一樣的禍害和危險（在匈牙利屠拉弟一流的先生們從內部破壞黨破壞蘇維埃政權）。對於機會主義的議員們，抱了這種錯誤的不徹底的無原則的態

度，一方面可以產生‘左派’共產主義，他方面在某種限度內，也可為左派共產主義的存在作辯護。賽拉提同志顯然是不對的，他指斥屠拉弟之‘不忠實’（共產主義第三期），但真正‘不忠’實的，却是意大利社會黨，因為他容忍像屠拉弟這類的機會主義的議員。

第八章 絕不妥協麼

從出版于佛郎堡的那本小冊子底引文中，我們看到，‘左派’是何其堅決地拾出這個口號，可憐，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命的人們，或希圖成爲馬克思主義者的人們，竟把馬克思主義底基本真理都忘掉了。試看恩格思——他同馬克思同樣是古希有的著作家，他們著作中每句話都含著極深遠的意思——在他反對那三十三個勃蘭基主義的公社派宣言上，怎樣的寫：

“勃蘭基“主義公社派在他們底宣言中這樣說：‘我們是共產主義者，因為我們要達到我們底目的，絕不停頓於半途，絕不妥協以宕緩勝利之日，延長奴隸之期’……”

“德國共產黨人之所以爲共產主義者，正因他們經過一切爲歷史進程所產生而非由自身造成的過渡階段與妥協，清楚看到並且始終追隨他們最後之目的：即消滅一切階級，建設這樣的社會制度，使土地及一切生產工具之私有制度，無復存留之餘地。

“而此三十三勃蘭主義者心目中之共產主義，乃在自以爲跳過了過渡階段及妥協之後，便一切如探囊取物，如果（這是他們確信的）今天‘動手’抓住政權，後天‘共產主義便實施了’，——因此，如不這樣幹去，便覺得自己不是共產主義者”了。

“這是何等幼稚的孩氣，把自己暴躁，當成理論的論據！”

恩格思在本文中對於魏良 (Vaillant) 深致敬意，提到魏良‘不可磨滅的功績’（魏良和葛德 Guesde 從前都是國際社會主義底偉大領袖，到了一九一四年八月以後都把社會主義賣了）。但這等明顯的錯誤，恩格思不能不予以詳盡的分析。自然，在年幼而無經驗的革命者看來，甚至在很有經驗很上歲數的小資產階級革命者看來，‘容許妥協’好像是異常危險，難懂而且錯誤的勾當；並且許多詭辯家（‘太有經驗’的政客），如像上面蘭斯盤雷同志捉到的英國機會主義的領袖這樣的辯論：‘如果布爾塞維克可以妥協，那麼爲甚麼我們不可以任情妥協？’。但是經閱無數罷工（只拿階級鬥爭底一種表現來說）底教訓之無產階級，很能領會恩格思所陳述的深遠的（哲學的，歷史的，政治的，心理的）真理。每個無產者都親身經過罷工，同他恨入骨髓的壓迫者剝削者，‘妥協’過，工人到了窮時，有時雖然他們要求的條件全未達到，或僅達到一部分也祇得上工；因每個無產者處在羣衆鬥爭和階級衝突尖銳化的境況之內。所以他很能認清各種妥協之差別，一種妥協是爲客觀的條件所迫（儲金窮竭，外方援絕，聲嘶力竭，困餓到極端），這種妥協，絲毫無傷於接受妥協的工人之革命忠心及他們準備將來爭鬥的決心。——另一種，‘叛賊’底妥協，他們貪圖自身利益（破壞罷工的工賊也締結妥協）懼怯，或希冀資本家底垂青，或屈服於資本家底威勢，或爲微利所誘，或爲甘言所惑，乃謬講於客觀原因（這種叛賊底妥協，在英國工人運動史中，職工

會領袖做的獨多，然其他各國工人，在各種不同的形式中，也都可以看到類似的現象）。

自然，也有異常困難複雜的情形，使人們要發最大的力量，才能決定這個或那個‘妥協’底真實性質——好像在無數殺人案件，決定這是正當的甚或必要的（如必要的防禦），抑是不可饒赦的粗心或細心擺佈的陰謀。自然在政治上，各國內及國際上各階級各政黨間之相互關係，錯綜混雜，較之罷工時決定‘妥協’是否正當，是否為工賊及賣階級領袖的背叛階級的‘妥協’底這種問題，更要困難得多。要想寫定藥方，製好規律（‘絕不妥協’），適用各端，療治百病，真是荒唐已極。要把自己的頭腦，穩放在自己的肩膀上，使之能在各個不同的情形中，分辨一切。黨的組織和黨的領袖（要配這個稱號）之作用，也就是在此；本階級一切能夠運用思想的代表，應在長期的堅苦的複雜的多方面的工作中，培養出必要的知識，必要的經驗，必要的——除了知識及經驗之外——政治警覺，使之可以敏速而正確地解決複雜的政治問題。（註）

（註）各個階級，即令在最開化的國家中，即令在那個最先進的因目前形勢而能把一切精神力量發揚到最高度的階級中，也常常有而且將來也必有（只要階級存在，只要無階級的社會還未在本身的基礎上完全鞏固，充分發展）不知思索不能思索的代表。假如不是這樣，資本主義便不是壓迫羣衆的資本主義了。

幼稚和毫無經驗的人們，以為祇要一般的承認可有妥協，便使機會主義（對於機會主義我們進行並且應該進行堅決的爭鬥）與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或共產主義間，絲毫沒有界限。這些人，假使是不曉得自然界以及社會中的一切界限都是變動的，並且在相當限度內都是有條件的，那麼除了予以不斷的教育，訓練，啓發，以及政治的和生活的經驗以外，再無他法可以救正。在每個或特殊歷史時期的實際政治問題上，要在能夠認清，那些人表現出不可饒赦的叛逆的浸潤危害革命

階級底機會主義的種種最重要的變相妥協，我們對之應加以說明并全力與之鬥爭。當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間在二派強盜成性絲毫無殊的國家中發生帝國主義大戰之際，愛國主義即擁護“保護祖國”，便是這樣機會主義的一個主要形式；擁護“保護祖國”實際上便是在這種戰爭中保護‘自己’資產階級底強盜利益。大戰以後，保護那強盜的‘國際聯盟’；擁護直接或間接對於本國資產階級之勾結，以反對革命的無產階級，反對“蘇維埃”運動；保護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資產階級的議會主義，以反對‘蘇維埃政府’，——凡此種種，盡是不可饒赦的叛逆的妥協之主要表現。總括起來，就成了危害革命無產階級與其事業的機會主義。

“……任何與其他政黨之妥協……一切縱橫 閹和妥協的政策，都應予以堅決之排斥”，德國‘左派’在佛郎堡小冊子內這樣的寫。

真奇怪，這些‘左派’既懷着這種見解，却沒有堅決地認責布爾塞維克主義！德國‘左派’不會不曉得布爾塞維克主義底全部歷史中，無論在十月革命前或十月革命後，都充滿對其他政黨，並且也對資產階級政黨縱橫弄閹與之妥協的事實！

推翻國際資產階級之鬥爭，比較各國間最劇烈的普通的鬥爭，還要繁雜，延長，複雜到百倍。要進行這種政策，而事先拒絕縱橫 閹的手腕，拒絕敵人間利害衝突之利用（即令是一時的），拒絕與可能的（即令是一時的的不定的動搖的有條件的）聯盟者之妥協——這不是大笑話麼？崎嶇峻峭，未通人跡之高山，如欲攀登峯嶺，則羊腸曲折，中道被阻，或須另尋他途；今於未曾動身之先，堅執一方，決不換路；左派意見，與此相較，有何差異？缺乏經驗不諳事理到了這種地步的這些人（如果真是因為年紀幼小，那還好；不過，即是少年人過了相當歲月，上帝也不許他說出這類昏話），却受到了（不管是直接的或間接過，公開的或暗地的，整個的或部分的）荷蘭論壇派底擁

護！

在無產階級第一次社會主義革命之後，在推翻了一個國家的資產階級以後，這國的無產階級，在很長的時期內，還是比較資產階級力量為薄弱；就是因為資產階級有驚人的國際連繫，就是因為在這國裏資產階級倒後，小的商品生產者仍然有使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自然地不斷地重新恢復和產生之可能。要想戰勝更有力的敵人，只有用最大的力量，並且必須最謹慎周到，細心敏捷地，一面利用敵人間每個（即令是最小的）間隙，利用各國資產階級間各國內部各種資產階級間的每個利益底衝突，他方面利用每個（即令是最小的）可能機會，以獲得羣衆的聯盟者；儘管這個聯盟者是一時的，動搖的，不定的，靠不住的，有條件的，都不要緊。誰要是不懂這點，誰就對於馬克思主義，對於現代科學的社會主義，一竅不通。在比較長久的時期中，在比較複雜的政情中，誰要是不會在實際上證明他會應用這個真理，那麼他就可以說還未學會，怎樣在鬥爭中幫助革命階級，以求把全體勞動的人民從剝削者手中解放出來。以上所說的，對於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前及以後的時期，都可適用。

馬克思，恩格斯說，我們底理論並非信條，而是行動底指導；像考茨基，奧陶鮑宛爾們的那些註冊的馬克思主義者之最大錯誤最大罪惡，便在他們在無產階級革命最緊要的關頭上，不懂這個真理，並且不能加以應用。政治的活動，不是尼瓦大街的廣道（這是彼得格勒一條寬廣清潔而且直道的大街）；馬克思時代以前的俄國大社會主義者采爾尼率夫斯基（Tschernyschewski）早已經說過。自采爾尼雪夫斯基以來，俄國革命家因忽略或忘懷這個真理之故，受了無數犧牲。我們要用盡力量，使西歐和美國的‘左派’共產黨人以及獻身於工人階級的革命家，在領略這個真理時。不至如落後的俄國人，費了這麼高貴的代價。

俄國革命社會民主黨人，在沙皇制度未倒亡以前，屢次利用了資

產階級自由派的効勞，就是說我們同他成立了無數實際的妥協。當一九〇一到一九〇二年間，布爾塞維克主義尚未發生之際，老“火星”報編輯部〔普列哈諾夫，阿克色洛特(Axelrod)沙蘇里赤(Sasultsch)馬爾托夫(Mertow)朴推萊素夫(potressow)和我在內〕同資產階級自由派政治領袖司脫魯維(Struve)訂了一公開的政治聯盟(自然不是長期的)，同時却懂得不斷地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同資產階級自由主義進行無情的鬥爭，防止他在工人運動中發生絲毫的影響。布爾塞維克黨人總是繼續採用此政策。自一九〇五年以來，他們總是堅持工人階級與農民的聯合，以反對自由資產階級與沙皇政府；但同時並不拒絕贊助資產階級去反對沙皇政府(例如在選舉第二期即複選時)，也不停止與資產階級革命的農民政黨即‘社會革命黨’作最堅決的思想上與政治上的鬥爭，揭破‘社會革命黨’是冒充社會主義者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在一九〇七年時布爾塞維克會短期的在國會的選舉上和“社會革命黨”訂立政治的同盟。在一九〇三到一九一二年間，我們在表面上好幾年與孟爾塞維克處在統一的社會民主黨裏，但永不停止和他們作思想的與政治的鬥爭，把他們看作無產階級內傳播資產階級影響的經紀人和機會主義者。在大戰時，我們同‘考茨基派’孟爾塞維克左派(馬爾托夫)及一部分‘社會革命黨’人如采爾諾夫(Tscheruow)，那達生(Nathasson)等，締結某種妥協；我們同他們在齊麥瓦爾特(Zimmerwald)金塔爾(Kienthal)並坐於一個會場中發表共同的宣言，但對於‘考茨基派’，對於馬爾托夫及采爾諾夫等之思想與政治的鬥爭，却沒有一刻鬆懈或停止過(那達生在一九一九年死時，很接近我們，幾成了同情我們的‘革命共產黨人’式之民粹派)。在十月革命底時候，我們曾同小資產階級的農民訂立了同盟；這個同盟雖不是正式的，但是極為重要而且有利益，我們那時採用了社會革命黨底整個農民政綱，未加絲毫修改；這就是說我們無疑地採用妥協手段，用以徵信農民，使知我們並非挾制他們，而是

的確想同他們諒解。同時我們更以正式的政治同盟（不久便實現了）建議於‘左派社會革命黨’，約他們參加政府；但到布勒斯特條約成立後，他們破裂了這個同盟，到一九一八年七月，甚至組織武裝暴動，後來更以武裝鬥爭反抗我們起來。

因此，德國‘左派’，因德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有了和‘獨立黨’（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即‘考茨基派’）同盟的意見，便肆力攻擊；這點不是鄭重出之的舉動，而且反足證明‘左派’的錯誤。我們俄國的右派孟塞維克，（參加克倫斯基政府的）與德國的賽得曼派類似，反對右派孟塞維克的左派孟塞維克（馬爾托夫）與德國的考茨基派相等。工人羣衆之逐漸離開孟塞維克而趨向於布爾塞維克，我們在一九一七年間，可以明白地看到。一九一七年六月第一次全俄蘇維埃會議上，我們票數，祇佔百分之十三，社會革命黨與孟塞維克佔大多數；到了第二次蘇維埃大會（舊曆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我們得了百分之五十一的票數。德國工人由右而左的轉移，與俄國全然相同，爲甚麼他不直接增加共產黨人勢力，而先增強居中的‘獨立’黨？這“獨立”黨不會有過獨立的政見，獨立的政策，而祇搖擺於賽得曼派和共黨人之間。

顯然的，德國共產黨人底錯誤策略，是許多原因中之一；德國共產黨人必須大胆地誠懇地承認這個錯誤，學得怎樣加以改正。這個錯誤，在於拒絕參加反動的資產階級議會和反動的工會；這個錯誤，就在無數‘左派’幼稚病的表現，這病現在大發；但因此也可以更徹底地，迅速地加以療治，使對於機體更有利益。

‘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內部，顯然是不統一的；在該黨中，除却這些不能了解蘇維埃政權與無產階級專政之意義，不能領導革命鬥爭的機會主義老領袖〔考茨基，希爾菲鼎等等；克里斯品（Crispien）勒得保（Ledebour）之流，也大部分是如此〕以外，還形成了一個無產階級的‘左派’並且發展的異常迅速派該黨數十萬黨員（我

大概有七十五萬許黨員)都是唾棄賽得曼而迅速地傾向共產主義的無產者。這個無產階級左派，在萊布齊(城名)的‘獨立黨’代表大會上(一九一九年)已經建議無條件地即刻加入第三國際。如果害怕同此派“妥協”，真是可笑。相反的，共產黨人必須尋找而且找得一個適當的妥協形式，一方面，使之可以幫助并且加速與此派之充分融合，他方面使共產黨人對於‘獨立黨’中機會主義右派之思想其政治的鬥爭，絲毫不致受阻。要定出這樣一個適當的妥協形式，大概不會是容易的事，然而也祇有牛皮大家，方能許給德國工人德國共產黨人以容易的‘致勝的道路’。

如果‘純粹的’無產階級，不為形形色色的由無產者到半無產者(他們的一半生活費，依靠勞動力的出賣)，由半無產者到小農(及一般小手工業者，小家庭工業者，小有產者)，由小農到中農等等的過渡形式所包圍；如果無產階級的內部，沒有發展程度不等的差別，沒有鄉誼、工會，甚至宗教等等的區分，那末資本主義便不成其有資本主義。因此，無產階級底先鋒，無產階級底覺悟部分，共產黨，就絕對的無條件的必須向其他各種無產階級團體各種工人及小有產者的政黨，採取縱橫捭闔的手腕，與之協商和妥協。但要懂得我們應用這個策略，是要把無產階級的覺悟力，革命精神和能力等等的一般水平線提高，以進行鬥爭，求得勝利，而不是加以降低。就中還要注意，布爾塞維克之戰勝孟塞維克，不但在一九一七年革命前，採取縱橫捭闔協商妥協之策略，即在十月革命後，也是如此。自然，這種策略的採用，要在能够幫助，促進，鞏固，增強布爾塞維克，以減弱孟塞維克。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孟塞維克也在內)無疑地要搖擺於資產階級之間，搖擺於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及蘇維埃政權之間，搖擺於改良主義與革命手段之間，搖擺於‘撫愛’工人及畏懼無產階級專政之間……共產黨人底正確策略，在能利用這種搖動而絕不賞加以忽略；既欲利用，便當對於那些正傾向於無產階級的一部份人表示讓步，同時

却要與那些傾向於資產階級一部份人爭鬥。應用正確策略之結果，遂使孟塞維克主義在我們這裏與日凋零，使崛強的機會主義的領袖孤立無援，使最好的工人與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中最好的分子，皆歸向我們方面。這乃是長期的過程。那「萬火急的『決議』，像『絕不妥協，絕不採取縱橫捭闔的手腕』等，只會妨害革命無產階級影響底增高與力量底擴大。

最後，德國『左派』骨直地堅持不承認凡爾賽和約，也無疑地是許多錯誤之一。像霍奈爾（Horuer）這樣的意見，表現的越『結實』越『鄭重』越『果決』越『堅執』，結果越是笨拙。在目前國際無產階級革命底情況之下，僅與荒謬絕倫的『國家布爾塞維克主義』（勞芬伯等）決裂（這個『國家布爾塞維克主義』甚至與德國資產階級訂立同盟，以和協約國作戰）是不夠的。要曉得，不許蘇維埃德意志志（如果德意志蘇維埃共和國，不久可以成立）暫時承認及服從凡爾賽和約，是根本錯誤的策略。但因此不能說，當率得曼聳高踞政府，當匈牙利蘇維埃政權尚未推倒，當希望維也納蘇維埃革命起來聲援蘇維埃匈牙利的可能，尚未斷絕，當處在這種情況之下時，獨立黨人要求簽字於凡爾賽和約，也是對的。那時獨立黨人底搬變手腕，使用得太蠢了。他們這樣只多多少少替賣階級的率得曼們負責，只是從對於率得曼們作無情的（而且是最冷酷的）階級鬥爭的觀點，多少的轉到一個『無階級』，『超階級』的觀點上。

現在的局勢分明弄成了這樣：德國共產黨人不允許受凡爾賽和約的牽制，並且預先聲說在共產主義勝利後，要無條件地堅決地拒絕凡爾賽和約，這是愚蠢。應該說：率得曼們考茨基們屢次叛賣階級，障礙（一部分并且直接毀滅）和蘇維埃俄羅斯蘇維埃匈牙利的聯合；我們共產黨人將採用一切方法，去促進這個聯合，準備這個聯合，至於凡爾賽條約，我們不必一定的并且立刻的加以拒絕。要知勝利地拒絕凡爾賽和約之可能，不僅視乎德國蘇維埃運動之勝利，并且還要依

靠國際蘇維埃運動之勝利。率得曼輩考茨基輩障礙這種運動，我們却要促成這種運動。問題之本質在此，根本的差別亦在此。如果我們底階級敵人——剝削者——及其走狗率得曼們考茨基們，把增強德國的及國際的蘇維埃運動，增強德國的及國際的蘇維埃革命之種種機會都丟過了，這是他們底罪惡。德國的蘇維埃革命，增強國際的蘇維埃運動，而國際蘇維埃運動，乃是反對凡爾賽和約，一般地反對國際帝國主義的最堅固的堡壘（而且是唯一的，可靠的，不可戰勝的，全世界上強有力的堡壘）。必然地，堅決地，立刻地把解脫凡爾賽和約的問題放在第一位，放在解放其他被壓迫國家使之脫出帝國主義壓迫的問題之前，這是市井小資產階級的國家主義（配於考茨基，希爾菲鼎，鮑宛爾等的一流人），而不是革命的國際主義。在歐洲任何大國內——德國在內——推翻資產階級，對於世界革命是極大的勝利；爲了他，即令讓凡爾賽和約比較長期存在，也是可以的，並且還是應該的。倘俄國單獨一國，能爲革命利益忍受布勒斯特和約至數月之久，則蘇維埃德意志與蘇維埃俄羅斯相聯，爲革命利益起見，亦何嘗不可以更久地忍受凡爾賽和約。法英等帝國主義者和德國共產黨人挑釁，搗好了陷穽，‘請你們說，你們不簽字於凡爾賽和約’；而德國‘左派’共產黨人果然像小孩子一般，踏進陷穽，不會靈敏地同狡猾的而且目下強過我們的敵人周旋，不會告訴他們說：‘我們現時簽字於凡爾賽和約’。事先縛住自己的手，公開地告訴武裝比我們完備的敵人，說我們是否而且何時同他作戰——這是愚蠢，這不是革命的精神。這場鬥爭分明是有利於敵而有害於己的，却要背城借一，這是罪惡。如果革命階級底政治家，不懂得“使用手腕，周旋妥協”，以避免必然敗北的戰爭，那麼這種政治家，是絲毫無用的。

第九章 英國的‘左派’

英國還沒有共產黨，但在工人中間簇新，廣大，有力的共產黨主義運動，激增茁長，前途有極大的希望。有幾個政黨和政治的組織（不列顛社會黨，社會工黨，南威爾斯社會主義協會，工人社會主義聯合會），已在往來協商，想成立一個共產黨。工人社會主義聯合會出版之工人無畏艦週刊，由蘇爾維亞·潘哈斯特同志（Sylvia Pankhurst）主編，內載她的向共產黨去一文（第六冊，四十八期，一九二〇年，二月，二十一日。該文敘述上述四組織談判的經過，過想根據加入共產國際承認以蘇維埃制度代替議會主義，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等原則，建立統一的共產黨。對於立刻成立統一的共產黨的一個最大障礙，是參加議會問題及新共產黨加入工黨問題上的爭執；這舊的工黨，是機會主義的狹義愛國主義的，工會式的，大半由職工會組成的政黨。工人社會主義聯合會及社會工黨（註）反對參加議會選舉參加議會，反對與工黨聯合，因此和不列顛社會黨全體（或是多數）黨員底意見相左；在他們看來，這些人是英國‘共產黨底右派’（見原文第五

頁)。

(註)社會工黨好像是反對與工黨聯合而不很反對參加議會

所以根本的爭執，和德國相同——雖然爭論表現的形式（在德國所表現的形式，比在英國所表現的，更要接近‘俄國的’形式）以及其他種種情形，極不相同。我們且看“左派”底證據。

關於參加議會問題，潘哈斯特同志以登載於該期雜誌的喀拉歇爾（Grillacher）同志底一篇論文為根據。這篇文章是喀拉歇爾同志以‘蘇格蘭工人蘇維埃’名義在克拉斯考（Glasgow）作的，他說道：

“這個蘇維埃，是堅決地反對議會政策的，他後面站着無數政治組織底左派，我們代表蘇格蘭的革命運動，企圖在工業內部（在工業各個部門內）建立革命的組織，並在全國，根據於社會委員會，來建立共產黨。我們同那官許的議會主義者，爭執好久了。公開向他們宣戰，我們以為大可不必，但他們也膽怯，不敢進攻我們。

“這種狀況，自然不能夠延長下去。我們現在全綫勝利。

“蘇格蘭獨立工黨底黨員羣衆，提到議會二字，便要作嘔一切地方團體，幾乎完全贊成蘇維埃（或工人委員會）。自然，借政治綑口的（或以政治為職業的）先生們要受嚴重影響，他們因此用盡手腕，想使他們底黨員歸到議會主義底懷抱裏。革命的同志們切勿（點劃依照原著）擁護這夥東西。我們將有極困難的鬥爭，這場鬥爭中最壞的表徵之一，便是那些只顧個人利益不顧革命利益的人底叛賣行為。對於議會主義之任何擁護，將使大權落於我們不列顛的率得曼們惱斯克們之手。亨得孫，史利乃斯之徒，已經反動到絕望的地步了，官許的獨立工黨，一天一天走到資產階級自由派勢力之下，這些自由派就利用麥克唐納爾（McDonald）史諾登（Snwden）一夥人，做思想的保障，官許的獨立工黨

極端仇視共產國際，而羣衆則贊成共產國際。無論用什麼方法，去幫助機會主義的議會政策的，只是甘受麥克唐納，史諾登之愚弄。不列顛社會黨，在此毫無作用……在此就需要一個健全的革命的生產的（工業的）組織及能够按照明白確切的科學原則去行動的共產黨。如果同志們能幫助我們建立產業組織或共產黨，我們下勝歡迎，如果不能幫助，而又不願意擁護反動派以叛賣革命，那麼，敬請千萬不要過問。這種反動派久已竭盡心力。希圖攫取議員底尊號？（問號依照原著）他們熱心仕進，處處要耍弄自己表示自己能和‘主人翁’能和那些階級政治家，一樣的處理政治。”

這封致編輯部的信，據我的意見，把剛剛走向共產主義的青年共產黨員及羣衆工作人員的情緒和觀點，表現得盡致。這種情緒最足歡迎，最有價值；應知道珍視和贊助這種情緒，因為沒有這種情緒，則英國的——以及任何國家的——無資產階級革命底勝利，是無望的，懂得傳達羣衆的這種情緒的人，懂得在羣衆中喚起這種（常常是隱隱的，不自覺的，未覺醒的）情緒的人，該受珍惜，該受種種愛護。但同時必須直接地明白地告訴他們，在偉大的革命運動中領導羣衆，僅靠情緒是不夠的。應該指出：這些致身於革命的人們所犯的或將要犯的這種錯誤是妨害革命事業的錯誤。喀拉歇爾同志致編輯部的這封信，無疑地含着一切那樣的錯誤底萌芽。這些錯誤，德國‘左派’共產黨人正在犯着，俄國‘左派’多數黨人在一九〇八及一九一八年間亦會犯過。

該信底著者滿腔蘊着最可寶貴的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階級政治家’的仇恨（這個仇恨不僅對於無產階級，並且對於一切勞苦羣衆，即德國人所說的一切‘普通人’，都很通俗和親近）。被壓迫者被剝削者底代表之這種仇恨，實是‘一切智慧之母’，實是每個社會主義運動與共產主義運動勝利之基礎。但是該著者分明未曾想到：政治是

一種科學，是一種藝術，不是從空而下，不是空手可得；無產階級要想戰勝資產階級，須鍛鍊自己的無產階級‘階級政治家’，並且要不弱於資產階級的政治家才好。

該信底著者很明瞭達到無產階級的目的底工具，不是議會，而只是工人委員會。凡到現在還不了解這點的人，不論他是位學者，是位最老練的政治家，是位最誠實的社會主義者，是位最淵博的馬克思主義者；或是正直的公民，或是望族，他總是最壞的反動派。但是“不叫”‘蘇維埃的’政治家進入議會，不先從內部破壞議會主義，不在議會內於解散議會之前，準備蘇維埃底勝利，這樣能够使蘇維埃戰勝議會麼？該信底著者連這個問題，都沒提出，甚至不會想到提出這個問題之必要。但他說英國共產黨必須按照科學的原則行動，却是十分正確的意見。科學第一—要求估計其他各國的經驗，尤其是那些正在經歷或不久以前已經歷過十分類似我們底經驗之資本主義國家；第二，要估計一切活動於該國內部的力量，團體，政黨，階級，羣衆；須知決定政策，絕不能僅僅依靠某一團體或某一政黨底願望與意志以及他底階級覺悟鬥爭精神之程度。

至於說亨得孫，克萊因斯，麥克唐納爾，史諾登等反動到絕望地步，這是對的。他們想把政權拿到自己手裏（預計同資產階級聯絡），他們想依據資產階級的老方案‘統治’，他們一旦攫得政權，一定和率得曼們惱斯克們如出一轍，這也全是對的。這些都不錯。但絕不能因此便說幫助他們，便是背叛革命；工人階級底革命家，爲着革命利益，應該予此等先生們以相當的議會的幫助。爲闡明這段意思起見，我利用英國目前兩種政治上的文件；（1）內閣總理勞合，喬治（Lloyd George）一九二〇年三月十八日的演講；（2）在上文中已經提到的‘左派’共產黨人蘇爾維亞，潘哈斯特同志底論斷。

勞合，喬治在他底演講中駁斥阿斯奇士（Asquith）（大會特意邀請阿斯奇士參加，但他拒絕了）及其他不願意與保守黨合作，而想

接近工黨的自由黨人（在喀拉歇爾同志信中，我們也可看到自由黨人轉入獨立工黨的事實）。勞合，喬治證明自由黨與保守黨聯合之必要，而且要聯合得親密，不然，工黨（勞合，喬治喜歡叫他作‘社會黨’）將會勝利，而企圖“共同擁有”生產工具，這個英國資產階級底領袖用通俗的語言，向着他底聽衆，向着自由黨國會議員（這些人以前大概絲毫不懂）解釋道：“這在法國，叫作共產主義，在德國叫作社會主義在俄國叫作布爾塞維克主義”。勞合，喬治聲明，這是自由黨人所根本不能接受的，因為自由黨根本贊成私有制度。他接着說“文明陷入危險中了”，因此自由黨必須和保守黨聯合。

“……如果你們走到農村區域，勞合，喬治說：那麼我同意，你們可以看到舊時的黨派的分別沒有變動。因那裏離危險尚遠，那裏還沒有危險。但是運動如果進及農村區域，則那裏的危險，也要和現在幾個工業區域一樣的大。我國五分之四，經營工商，務農者不及五分之一；這是我在想到將來的危險時，時時顧慮到的一種情形。法國居民多係務農，他們有確定的觀念底堅實基礎，不易動搖，不易受革命運動底激盪。在我們國家裏就不同了。我國比世界任何其他國家都容易顛覆；如果一天開始動搖起來，那麼因上述原因，將比一切其他國家都崩壞得更厲害。”

諸者試看，勞合喬治不僅是個很聰明的人，而且從馬克思主義者那裏學得了不少的東西。我們也不妨從勞合，喬治那裏拿些東西，勞合喬治演講畢，舉行討論。其中一幕非常有趣：

“瓦拉斯（G Wallace）：‘請問內閣總理，對於他在工業區域內對產業工人所取政策的結果，取何態度？這些產業工人中有許多現在是自由黨人，擁護我們極力。目下忠實地擁護我們的工人將來會不會轉過去加強工黨底勢力？’

‘內閣總理：‘我具着完全不同底意見。自由黨人互相傾軋，使無數自由黨人失望而轉入工黨，在工黨內你可以找到許多自

由黨人，很能幹的人，日以破壞政府威信爲能事，結果無疑地要使一般輿論贊助工黨。一般輿論，不趨向於工黨以外的自由派，而趨向於工黨，部分的選舉已可證明’。

附帶說明一句，這個論斷，證明了資產階級中最聰明的人們，是怎樣張皇失措，而不能不幹無救的蠢事。資產階級也必因此滅亡。我們底人，或許也要做些蠢事（自然，要這些蠢事不很大，而要改正得快才行），但最後，總要成爲勝利者。

另外的政治文件是下面‘左派’女共產黨員蘇爾維亞·潘哈斯特同志的評論：

“……應克平（Inkpin）同志（不列顛社會黨書記）說工黨是‘工人階級運動之最重要組織’。不列顛社會黨另一同志在第三國際會議上把不列顛社會黨底意見表現的更明白，他說：‘我們把工黨看做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

“我們不贊同這樣批評工黨的意見，工黨內大多數黨員，雖然都是不活動不振作的，但就黨員底數量而言，却是很大；這是加入職工會的男女工人，他們因爲廠中的同伴是職工會底會員，並且要想領取救濟費，所以也就加入了職工會。

“但是我們承認工黨之所以沒有這樣多的黨員，也是因爲不列顛工黨是一種特種學派之產物。雖然民衆底腦子裏已醞釀着重大變化，而快要把現狀改變，但是英國大部分工人階級現在還沒有跳出這個學派底圈子……”

“……不列顛的工黨，和其他各國的社會愛國組織一樣，在社會自然發展底過程中，必將當權。共產黨人之任務是在聚集力量去推翻這些社會愛國派。我們在英國，不應拖延這種活動，也不應遊移。

“我們不應分散我們底力量，去增加工黨的勢力。工黨之上台，是不可避免的。我們須集中我們底力量，建立共產主義的運

動，以戰勝工的，工黨不久就要組織政府了，革命的反對派須準備進攻……”

這樣看來，自由派資產階級，放棄他們歷史上百年來經驗所珍視的（而且對於剝削者異常有利的）‘兩黨’（剝削者的）制，認為必需聚集力量，向工黨作戰。一部分自由黨人，和沉舟上的耗子一般，跳到工黨方面。‘左派’共產黨人承認工黨必將得到政權，並且承認現在大多數工人，贊成工黨。從這上面他們作出這個奇怪的結論，像蘇爾維亞，潘哈斯特同志所說的：“共產黨不許妥協……必須潔白無疵保持其黨義，保持絲毫不染改良主義的獨立；他底使命是勇往直前，不要中途駐足和轉變，筆直地向共產主義革命走去”。

恰該相反：因為英國多數工人尚追隨於英國的克雷斯基們率得曼們之後，他們還不會在這般人底政府下嘗過滋味，在俄國德國，正因為嘗過這個滋味，工人方大批地轉向共產主義，所以對於英國的結論，無疑地應該是：英國共產黨人必須參加議會，必須從議會內部幫助工人羣衆在實際上認識亨得孫，史諾登政府底結果，必須幫助亨得孫，史諾登等戰勝聯合的勞合，喬治與吉邱爾（Churchill，保守黨首領）倘不是這樣幹去，便要使革命事業更加困難，因為多數工人階級底見解，不經變更，革命是不可能的。這種變更必然要依靠羣衆的政治經驗，僅恃宣傳，是絕對不行的。如果現在顯然無力的工人階級的少數，明曉得（不論如何必須曉得）多數工人在亨得孫，史諾登戰勝了勞合，喬治，邱吉爾之後，經過短時期便會對於他們自己的領袖失望，轉來擁護共產主義（不論如何，最少要對共產黨人守中立而且大部分是善意的中立），而却高呼“不妥協，不中途轉變，勇往直前”，那末這個口號分明是錯的。這好像以一萬人與五萬強敵鏖戰，而不‘中途駐足’，不‘改道’不‘妥協’，以待十萬援兵，以待即刻尚不能出發之援兵。這只是知識份子的兒戲，而不是革命階級鄭重從事的策略。

革命底根本原則，經過一切革命，尤其是經過三次俄國革命所證實了的，可以說是：要革命，僅是被剝削被壓迫的羣衆，覺悟不能照舊制度生活下去，而起來要求改革，這還不够，要革命，還須剝削者不能照舊制度生存和統治下去。祇有‘下層’不願照舊生活下去，‘上層’不能照舊統治下去，祇有這樣，革命才能勝利。這個真理換句話說就是：沒有全國的恐慌（被剝削者與剝削者全被牽動），革命是不可能的。

因此，要革命，第一，須多數工人（至少也須覺悟的，深思熟慮的，在政治上積極的工人之多數）完全明瞭革命之必要，且甘爲此革命赴湯蹈火；第二，統治階級經歷政府的恐慌，這種政府的恐慌，將牽動最落後的羣衆，加入政治運動中（每個真正革命之表誌是：從前漠不關心於政治爭鬥的被剝削勞動羣衆中，產生大量的真正能够幹政治鬥爭的代表，他們的數量增至十倍或甚至百倍），減弱政府底權力，革命黨人因得一舉而覆滅之。

就勞合，喬治底演辭中，也可以看到，在英國，勝利的無產階級革命之兩個條件，日漸發長。所以這時‘左派’共產黨人的錯誤，便特別危險，正因爲就此可以看到好多革命者對於這兩種條件，都觀察得不充分深入，不十分注意，不充分自覺，不充分周到審慎，如果我們不願做一個革命的小團體，而要做革命階級底政黨，而要征取羣衆（沒有這點，便成了大言不慚的清談家），則第一我們必須助亨得孫，史諾登去打倒勞合，喬治，邱吉爾（正確點說；逼迫前者，去打倒後者，因爲前者害怕自己的勝利！）；第二，我們必須幫助工人階級底多數，使他們在自己的經驗上，證實我們主張的正確；這就是說，我們必須幫助他們去認清亨得孫，史諾登輩之無用，認清亨，史輩小資產階級的叛賣階級的天性，及其破產之不可避免；第三，我們必須逼近這個時機，使那時根據多數工人，根據他們自己對於亨得孫輩之失望，可以有極大勝利的機會，以一舉而推翻亨得孫們底政府，如果

那個精明強幹，不是小資產階級而是大資產階級的勞合，喬治，要因昨天和邱吉爾的‘衝突’今天和阿斯奇士的‘傾軋’，而表現完全塌斃的狀態，減弱自己（及全體資產階級）的力量，讓亨得孫們的政府，那時一定要張皇失措，進退維谷。

我要更具體點說。我以為，英國共產黨人必須把他們底四個政黨及派別（四個統統很弱，有幾個更弱得不堪），根據第三國際底原則根據必須參加議會的條件，聯合成一個共產黨。共產黨建議於亨得孫，史諾登們，來成立‘妥協’及選舉上的協作。我們共同反對勞合，喬治及保守黨底聯合，按照工人投給工黨或共產黨的票數，共分國會內的議席（不在選舉時，而照特別表決手續），同時我們保留煽動宣傳及一切政治活動之完全自由。自然沒有最後這個條件，就決不能和他們成立聯盟，因為成立這種聯盟便是叛賣階級。英國共產黨人必須和俄國布爾塞維克黨人（從一九〇三到一九一七年共十五年之久）對於俄國的亨得孫，史諾登們（即孟塞維克）所取的態度一樣，堅持揭發亨得孫，史諾登們的完全自由。

倘亨得孫，史諾登們贊同在這種條件下訂立聯盟，我們便戰勝了，因為議席底數目，我們認為絕對不關重要；我們不是爭奪議席，這點上儘可通融（但亨得孫們，尤其是他們底新朋友——也可以說是他們底新主人——那些新跨入工黨的自由派，主要的正是為獵取議席）我們戰勝了，因為可以把我們底煽動，傳達到這時被勞合，喬治自己‘鼓勵’起來的羣衆中，我們不僅幫助亨得孫們加速組織政府，並且更要幫助羣衆加速了解我們全部共產主義的宣傳。我們將一段也不刪節，一點也不緘默地進行這種宣傳，以反對亨得孫們。

如果亨得孫，史諾登們拒絕在這種條件下訂立聯盟，我們更戰勝了；因為我們立刻便可指示給羣衆看（要注意就在那個純粹是孟塞維克完全是機會主義的獨立工黨內，羣衆也是贊成蘇維埃的），亨得孫們怎樣寧願與資本家勾結，而不願聯合一切工人。我們立刻便可在羣

衆底眼目中得到勝利，這些羣衆特別在聽了勞合喬治那段很正確很有益（對於共產黨人）的漂亮的聲明之後，將更同情於全體工人的聯合，以反對勞合，喬治及保守黨。我們立刻便獲得勝利，因為我們在羣衆面前證明亨得孫，史諾登們，害怕戰勝勞合，喬治害怕單獨取得政權，而偷偷摸摸地企圖獲得那個明目張膽地協同保守黨來反對工人的勞合，喬治之幫忙。這裏要指出，我們俄國布爾塞維克黨人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舊曆）革命之後，所有反對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這就是說反對俄國的亨得孫，史諾登們）的宣傳，正因為利用這種情況，才能獲得勝利。我們那時告訴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說：丟去資產階級，來獲取政權罷，因為你們在蘇維埃中佔有多數（在一九一七年六月第一次全俄蘇維埃會議上，布爾塞維克黨總共票數僅佔百分之十三）。但是俄國的亨得孫，史諾登們，不和資產階級一起，便害怕取得政權；而資產階級明曉得在立憲會議選舉中（註），社會革命黨與孟塞維克（兩黨在極親密的政治聯盟中協作，實際上祇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必將獲得多數，於是把這個選舉延宕下去，而社會革命黨與孟塞維克却沒有能力來毅然決然地澈底地反對這種延期。

（註）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立憲會議選舉結果，參加選舉者凡三千六百萬人以上。布爾塞維克黨獲得百分之二十五票數，地主及資產階級各政黨共百分之十三的票數，其餘百分之六十二的票數為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即社會革命黨孟塞維克與接近社會革命黨孟塞維克的各小團體所得。

如果亨得孫，史諾登們拒絕同共產黨人聯盟，共產黨即刻便可獲得羣衆底同情，揭穿亨得孫，史諾登們底假面具；即令我們因此失去幾把議席，絕對無關輕重。我們只在少數極端可靠的區域內，提出我們底候補人；即是說，我們候補人的提出，不會使該地自由黨人，戰勝工黨黨員。我們進行選舉的宣傳，散發傳單，以擁護共產主義；在

一切區域內，要是我們沒有自己的候補人，便介紹投工黨黨員的票，反對資產階級。潘哈斯特，喀拉歇爾兩位同志，以為這樣便是背叛共產主義，便是對於社會主義的叛徒停止鬥爭，那就錯了，恰恰相反，共產主義革命底事業，無疑地可從此得到利益。

英國共產黨現在就是僅想接近羣衆，僅要羣衆聽他們的話，已常時感到異常困難。如果我以共產黨人的名義登台，聲明請大家投票贊成亨得孫，反對勞合，喬治，便管保羣衆聽我講話了。於是我不僅能淺顯地說明爲甚麼蘇維埃比議會好，無產階級專政比邱吉爾們（這些人用資產階級‘民主’的招牌掩飾着）專政好；並且也可以說明我之投票贊助亨得孫等於以絞索懸掛絞犯。以後亨得孫們的執政將益證明我意見的正確，使羣衆轉而向我，因之促進亨得孫，史諾登們在政治上的死亡，像俄德兩國裏他們的同伴所遭遇的一樣。

或者有人起來辯道，說“這策略太狡猾太複雜，恐怕難令羣衆了解，恐怕只會分散割裂我們底力量，妨礙我們蘇維埃革命力量之集中等等”。我便要對這般‘左派’反對記者說不要把你們底高論，推在羣衆身上，俄國羣衆底文化程度，總不較英國爲高，而較英國爲低；但羣衆竟瞭解了布爾塞維克。布爾塞維克黨人也不妨在蘇維埃革命之前夜，在一九一七年九月，提出自己的資產階級議會（立憲議會）的候選名單。緊接着，在蘇維埃革命後，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又舉行這個立憲會議的選舉（到次年正月五日便被驅散）；這個情形，不但沒有妨礙，而且還幫助了布爾塞維克。

至於英國共產黨人中間第二個關於該不該聯合工黨問題的爭執，我在此不能多說，因爲我關於此問題的材料太少，而此問題又異常複雜；且英國‘工黨’在其本身結構上，異常奇特，與歐洲大陸普通政黨，很少相似之處。不過毫無疑義地可以說，第一，如果那個人要想從這樣的原則，如“共產黨必須潔白無疵地保持其黨義”，保持絲毫不染改良主義的獨立；他的使命，是勇往直前，不要中途駐足和轉變

，筆直地向共產主義革命走去”等等，去引伸革命無產階級的策略，那麼，他對於這個問題也要陷於錯誤。因為這類原則，只會重演法國勃爾基公社派在一八七四年宣布‘否認’任何妥協任何過渡階級時所犯的錯誤。第二，這裏的任務，和任何時候一樣，是要把共產主義一般的根本原則，應用到各階級各政黨間關係底特殊情形上，應用到趨向到共產主義去的客觀發展中底特殊情形上；這些特殊情形，為各該國家所固有，所以應該能夠加以研究，探索，和揣摩。

關於這點，不僅是講到英國共產主義，而且要對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內共產主義的發展作一般的結論。現在我們就轉到這個題目。

第十章 幾個結論

一九〇五年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在世界歷史上開了一個異常特殊的轉變：在一個最落後的資本主義國家，罷工運動，達到全世界從來所未有的廣大範圍和力量。祇在一九〇五年正月一個月內，罷工的人數，就十倍於以前十年間（一八九五——一九〇四年）；每年平均罷工的人數，自一九〇五年一月到十月，罷工更大規模地與日俱增。在無數特殊的歷史條件的影響之下，落後的俄國不僅首先給全世界指示出被壓迫羣衆底獨立精神之急速增長（這點在一切大革命中都是如此），而且更指示出無產階級的偉大作用；這作用遠較他在全人口中所佔的比重爲大。此外更指示出經濟罷工與政治罷工之聯絡，由政治罷工進入武裝暴動的轉變以及受資本主義壓迫的階級中，新的羣衆爭鬥與羣衆組織形式的產生——蘇維埃的產生。

一九一七年之二月及十月革命，使蘇維埃在全國各方面地發展起來，並且更使他們進抵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不到兩年，蘇維埃之國際性質，此種鬥爭與組織形式，在全世界工人運動中之傳播

，以及蘇維埃成爲資產議會制度及一般資產階級德謨克納西之掘墓人與承繼者的這種歷史使命，都表現得淋漓盡致。

不僅如此。工人運動的歷史，現在指示出來，在一切國家中，目前的任務（這個階段已竟開始）是：日形壯大嚮往勝利的共產主義，應該第一（而且主要地）和本國（每個國家的）的‘孟塞克主義’搏戰，即是要與那機會主義，社會愛國主義搏戰；第二（看來可以說是補充）要與那‘左派’共產主義搏戰。第一種鬥爭，在一切國家內，毫無例外的可以說是第二（目前事實上已經打死了）國際與第三國際間之鬥爭。第二種鬥爭，在德國，在英國，在意大利，在美國（至少是‘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反無政府工團派的一部，他們除差不多一般地整個地承認蘇維埃制度外，更固執“左派”共產主義者的錯誤）在法國（從前工團派底一部分，對於政黨及議會政策，採用同樣態度；但他們也是承認蘇維埃制度的），都可以看到，就是說毫無疑義地非但在國際間，而且在全世界上都可以看到。工人運動之戰勝資產階級，雖然到處都要經歷大體相同的準備時期，但各國工人運動發展之完成，則各異其致。布爾塞維克主義在俄國，準備十五年之久，始能成爲有組織的政治派別，而取得勝利；在各先進大國，其進行必然迅速得多。第三國際在這一年的短時期中，已獲得很大的勝利；那黃色的社會狹義愛國主義的第二國際，在幾個月前，還好似龐然大物，不知比共產國際強多少倍，享受世界資產階級各方面的——直接的，間接的，物質的，（關員高位，護照，報章），思想的——贊助，而今却被第三國際打敗了。

現在的問題是，各國共產黨人，應該自覺地認清根本的任務，同機會主義與‘左派的’清談主義奮鬥；更要把在這場鬥爭中，由各國經濟政治文化民族結構（愛爾蘭等）殖民地宗教派別等等之特質所形成的所必然形成的具體特點，加以估計。現在到處都感覺到對於第二國際之不滿，這種不滿，繼續擴大和增加，一面是因爲第二國際底機

會主義，一面也是因為他不能創立真正集中真正能够領導的中央機關，以指揮革命無產階級在企圖建設世界蘇維埃共和國的爭鬥中所應取的國際策略。應該根本認清，這樣一個中央指導機關，是絕不能建築在依樣葫蘆的刻板的一致鬥爭策略之規律上的。各民族間各國家間的民族和國家的界限一日存在（這些界限，縱然在全世界無產階級專政實現以後，還要很長期地存在），則各國共產主義工人運動底國際策略之統一，不在排除此種特異之點，不在取消此種民族界限，（這在目前，是癡人說夢），而是要去正確地應用共產主義底根本原則（蘇維埃政權，無產階級專政），使之正確地就各地特點作形式上的變動，使之正確地適合於民族的民族國家的特殊情形。在各國解決統一的國際任務，戰勝工人運動中之機會主義與‘左派’清談主義，推翻資產階級，建設蘇維埃共和國與無產階級專政等的具體過程中，考察，研究，探索，揣摩，和熟知民族的特殊，和固有之點，是一切先進國家（不僅是先進國家）在目前歷史階段上所遇到的最主要任務。在吸引工人階級底先鋒隊，使其贊助蘇維埃政權反對議會主義，贊助無產階級專政，反對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等等上面，最重要的（自然還說不到全部，不過祇是最重要的）是做到了。現在要把一切力量，一切精神集中在下一步。這一步，看着好像不甚主要——在某種立場上看去，也的確不甚主要——但在實際上，却是更接近於實際的任務底解決。這一步是：必須找得過渡到或趨進於無產階級革命的形式。

我們在思想上，已經取得了無產階級的先鋒隊。這是主要的事。沒有這個，勝利底第一步也是做不到的。但是從此到勝利，還離開得很遠。僅靠先鋒，不能獲勝。倘然整個階級，廣大羣衆不直接援助先鋒隊，或至少不對先鋒隊守善意的中立，對於敵人不是絕不贊助，那麼，這時僅把先鋒隊驅入死戰，不僅是愚蠢，而且是罪惡。想要整個階級，想要廣大勞動羣衆，被資本所壓迫的廣大羣衆，都走到這步，僅靠宣傳煽動，還是不夠的。這裏要靠羣衆自己的政治經驗。這乃

是一切大革命底根本規律，不僅由俄國，而且也由德國彰明較著地證明了。不僅文化低落且常時目不識丁的俄國羣衆，即文化卓越智識豐富的德國羣衆，也須以自己的皮肉，親嘗那第二國際英雄們所組織的政府之全盤懦弱無能，喪心病狂，狼狽失據，婢妾行徑（對於資產階級）卑污手段等等，親嘗不可避免的極端反動派之專政（俄國之柯尼洛夫，德國之卡普之徒）；這與無產階級專政相對照，逼着他們不能不擇個去從，而決心走向共產主義。

國際工人運動中覺悟的先鋒，即共產主義的政黨，集團，派別等的目前的任務，是要懂得去率領廣大（而現在多數尙是沉睡，冷漠，守舊，暮氣沉沉，而沒有覺醒）羣衆進入新陣地；正確點說，是要懂得在過渡到新陣地時，不僅會指揮黨，更須會指揮羣衆。如不能在思想上，政治上，完全戰勝機會主義與社會愛國主義，則第一種歷史的任務，即吸引無產階級覺悟的先鋒到蘇維埃政權與無產階級專政這一邊來的任務，就不能完成；如不能肅清‘左派’清談主義，而完全糾糾和改去他的錯誤，則第二種目下切身的任務，率領羣衆，佔據新陣地，以保障革命中先鋒的勝利，亦不克實現。

如果祇談到吸引無產階級底先鋒使之走向共產主義，那麼，宣傳便佔第一位，就是那些政治研究的小組，雖然帶着全部小組的弱點，也是有用的，也可收得成效的。如果談到羣衆實際的行動，如果談到百萬大軍的排佈——假使這個名詞可以應用——而要分列該社會內一切階級力量，以作最後的決戰，則僅靠宣傳的慣例，僅僅重複‘純粹的’共產主義底真理，甚麼也不行。這裏不能只算到幾千人，像還不會領導過羣衆的小團體的宣傳員在實際上所想的樣子，這裏要以數百萬數千萬計。在這裏自己不僅要問，我們是否已使革命階級底先鋒信服；而且還要問，一切階級的動力（絕對要一切階級，毫無例外）——在歷史上，是否已經佈置就緒，使最後的決戰，已充分成熟。這樣使；（1）仇視我們的一切階級力量，已充分混亂，已搏戰到充分程度

• 已由戰爭充分地減弱他們的力量，使他們再勝任不起；（2）一切動搖不定，畏首畏尾的中間分子，即是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要和資產階級分開）已在民衆前，充分揭破了自己，已因實際上的破產，充分陷入羞辱的地位；（3）在無產階級中，反對資產階級，贊助極堅決極勇敢的革命行動底那種羣衆熱情，已經開始並且洶湧地增長起來。在這樣狀況之下，革命方才成熟。如果我們能夠正確地估計上面簡括地所敘述的條件，正確地擇定作戰的時機，則我們底勝利，便得保障了。

一方面邱吉爾，勞合，喬治（這種政治人物，各國都有，只帶着一些民族的差別）間之差別，另一方面亨得孫，勞合，喬治間之差別，從純粹的共產主義即抽象的共產主義亦即尚未成熟到羣衆實際政治行動之共產主義底觀點上看來，固然無關輕重；但從羣衆實際行動底觀點上看來，則此種差別，實是異常重要。一個共產黨人如果不僅是覺悟的堅決的思想宣傳家，而具願意做個革命中羣衆之實際領袖，則他的整個任務，便是要去估量和決定這些朋友們中間不可避免的衝突會在什麼時候完全成熟，這些衝突必然減弱這些‘朋友’的總力量。應該把極端忠於共產主義理想之熱誠，與必要的實際的隨機應變縱橫捭闔之手段，曲折進退之才具融合起來，才可促進亨得孫輩（倘不臚舉人名的話，那麼就是第二國際之英雄們，就是說小資產階級民主之代表，而自命為社會主義者的人們）政權之實現與倒台、促進他們實際上必然的破產。遵照我們底精神，順着共產主義底方向以啓發羣衆，加速亨得孫——勞和，喬治——邱吉爾中間（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立憲民主派——君主專制派；率得曼——資產階級——卡普之徒等）必然之矛盾，爭執，衝突和完全崩裂；并且正確地擇定這些，‘神聖私有財產之基石’崩裂得最厲害的時機，作無產階級之堅決的進攻，以撲滅此輩，奪取政權。

一般的歷史，特別是革命史，比最先進階級之最好政黨與最覺悟

的先鋒隊所想像的，還要內容豐富得多，還要複雜宏博‘狡猾’得多。這是明白的因為最好的先鋒隊，表現幾萬人民底意識，意志，情感和想像；而革命則是在全體人民能力特別高漲和緊迫的時候，為激烈階級鬥爭所鞭策的數千萬人之意識，意志，情感，想像。由此便得着兩個極重要的實際結論：第一，革命階級，為實現任務起見，須能駕御一切（絲毫不能除外）社會活動之形式（在奪取政權後，常須冒極大危險，遇極大困難，以完成其在奪取政權前所未完成的任務）；第二，革命階級，須時時刻刻準備非常迅速地出其不意地以一個形式代替一個形式。

一個軍隊，倘不準備好應用敵人所有的或可有的一切武器，一切鬥爭手段和一切鬥爭方法，那麼誰也要承認這個軍隊底態度，不僅愚蠢而且簡直是罪惡。這在政治上比在軍事上更甚。在政治上，在將來各種不同的條件下，對於我們，何種鬥爭手段可用，何種鬥爭手段有效，更少能夠預料得出。倘我們不能應用一切鬥爭的工具，那麼在別個階級的陣地上，一旦發生超出我們意外的變更，而提出我們所特別見解的活動形式時，我們就會受極大的失敗（有時甚至是致命的失敗）。我們倘能應用一切鬥爭手段，而又代表真正先進真正革命的階級底利益，那麼縱然環境不容我們採取最厲害的，可以最快地致敵人死命的那種武器時，我們也必然能夠勝利。沒有經驗的革命者，常以為公開的鬥爭手段，是機會主義的，因為資產階級在這個範圍內，特別不斷地（特別是在非革命時期，‘和平’時期）欺騙和愚弄工人，他以為秘密的鬥爭手段才是革命。這是不對的。是的，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帝國主義戰爭時，當最自由最德謨克拉西國家的資產階級，極端無恥極端兇狠地欺騙工人，禁止他們這破大戰的強盜性質之際；是的，在這樣狀況之下，那些不能或不願（請你不要說‘我不能’，而說‘我不願’）採用秘密鬥爭手段之政黨和領袖，確是機會主義者和工人階級的叛賊；但是革命者如不能把秘密的鬥爭手段和一切公開的

鬥爭手段聯結起來，那麼便是最壞不過的革命者。在革命已經暴發擴大的時候，誰都加入革命，有的是狂熱，有的是趕時髦，有的甚至是貪婪個人利益；這時做革命者，並不為難。無產階級要在奪取政權後，提心弔膽聚精會神地從這批所謂革命家中‘解放’出來。但當直接的公開的真正羣衆與革命鬥爭的條件尚未來到時，而能在這種非革命的環境中，有時甚至在直接反動的環境中，在不革命的機關內，在不能即刻看清革命鬥爭方法之必要的那種羣衆中，為革命底利益奮鬥（宣傳，煽動，組織）。作這樣一個革命者，就困難得多了——也有價值得多了。要能尋找，覺到，正確地擇定那些事變的具體道路或特別轉機以統率羣衆，做真正的，決勝負的，最後的，偉大的，革命鬥爭——這便是西歐和美國目前共產主義底主要任務。

例如英國，我們不能曉得——無人能夠事先決定——那裏何時爆發真正無產階級的革命，何種變故最會喚醒和掀起廣大的羣衆，使之加入鬥爭中；所以我們須負責進行我們準備的工作，我們要四足都裝上鐵蹄（象已故的普列哈諾夫在還是馬克思主義者和革命家時，所常時愛說的）。可能的，一個議會的恐慌，會使殿冰破碎粉裂；可能的，殖民地與帝國主義間之衝突，日益紛擾，日益嚴厲，使恐慌一生，全局動搖；此外，還有許多其他可能的事變。我們用不着說，將來何種鬥爭會決定英國無產階級革命之命運（此問題絕對不能引起任何共產黨人之疑竇，這個問題對於我們大家，已經解決了，並且已經堅決地解決了），我們所說的是何種變故，現在可以推動沉睡的羣衆，使之堅決不拔地獻身於革命。我們不要忘記，就在那資產階級的法蘭西共和國，當國際和內部的情況百倍不及現在這樣革命之時，一個‘不意的’，‘微末的’事變，反動軍閥千百種無恥行爲中之一種（德萊菲案），也幾足引動民衆，爆發內戰！

共產黨人在英國，須要堅苦有恆不撓不屈地利用議會選舉，利用不列顛政府對愛爾蘭政策，殖民地政策，帝國主義政策上之一切變化

，利用其他各部分各方面的社會生活；到處按照新方法，按照共產主義的方法，不是根據第二國際底精神，而是根據第三國際底精神，努力工作。我在此沒有時間，沒地方，來描寫‘俄國’‘布爾塞維克’參加議會選舉議會鬥爭底方法，不過可以確定地告訴外國共產黨人，即俄國的議會選舉運動，與一般西歐的完全不同。由此往往得着這樣結論：‘是呵，在你們俄國，是如此，在我們這裏，制度却是另一個樣子’。這是很錯誤的結論！全世界共產黨人，第三國際在各國的信徒，正是要在各條路線上，在各部分的生活上，把那舊的社會黨的職工會的工團主義的議會工作，改造為新的，共產主義的議會工作。便在我們底選舉裏，產也會有過不少機會主義的，純粹資產階級的，詐偽騙人的資產階級行爲，西歐和美國的共產黨人，必須學習創造一個新的，非比尋常的，非機會主義的，非野心家的議會政策，使共產黨人底政黨提出自己的口號；真正無產者協同還未組織備受壓迫的貧民，散發傳單來往出入工人底宿處，鄉村無產者底茅屋與窮鄉僻野的農舍（幸而在歐洲不像我們這裏有這多的窮鄉僻壤，在英國尤少），進入一般平民所來往的茶館酒店，參加平民會社和不時的集會；黨同民衆說話，不要滿口理論（也不要太‘議會式’了）；黨不是爲獵逐議席，而不能處處啓發思想，吸引羣衆，乘機鉗制資產階級底口，利用資產階級所設立的機關，所規定的選舉，及其布告民衆的宣言，在選舉時，能够這樣地利用平素（在資產階級底統治下）所得不到的機會（自然除了大罷工以外；大罷工時，我們有同樣的普遍煽動機關，那時工作更力），使羣衆能够儘量認識布爾塞維克主義。在西歐和英國進行這種工作，自然是非常非常的困難，但這是可以而且應該做的；不吃苦，一般共產主義底問題，不能解決；在解決實際問題上，就應吃苦。這些實際問題一天比一天複雜，一天比一天地更和各部分社會生活結合；我們也要一天一天地，把各個部分，統從資產階級手中奪過來。

在英國，在軍隊內，在‘本’國被壓迫的和不得完全平等待遇的民族中（愛爾蘭，殖民地），一切宣傳，煽動，組織底工作，應照新的道路（不是社會黨的，而是共產黨的；不是改良主義的，而是革命的）進行。一般的在帝國主義時代，特別在大戰之後。當各民族精疲力竭，張開了認識真理的眼睛時（要知數千萬人或死或傷，只為解決一個問題，即英國的強盜，或德國的強盜，那個該多搶些地盤？）——在社會生活底各區域上，堆滿了火藥，最容易釀成衝突，恐慌，而增進階級鬥爭。

我們不曉得，也不能曉得，在現在全世界經濟政治的恐慌底影響下，一切國家內，無數火星橫飛，到底那顆火星將能燃起燎原之火，把羣衆從大夢中喚醒；因此我們就該負責，根據我們新的共產主義的原則去‘改造’一切，甚至在那最陳舊的，最腐敗的，看着最無希望的區域內進行改造工作。不然，我們便不能勝任裕如，便不能周知各方。便不能使用各般武器，便不能戰勝資產階級（他用資產階級的方法，建設——現在並且破壞——各方面社會生活），便不能準備得充分，以便在勝利之後，照共產主義路線，改造全盤社會生活。

當俄國無產階級革命以後，當這個革命在國際上獲得出乎資產階級及老學究們意外的勝利之後，全世界換了一個樣子，資產階級也到處換了一個樣子。資產階級受了‘布爾塞維克主義’底恐嚇，恨之刺骨，於是一方面他加速事變底進展，他方面，聚精會神，以暴力壓迫布爾塞維克主義；因此他在無數其他部分的社會生活上，減弱了自己的地位。這兩種情形，一切先進國家的共產黨人在決定策略時，應當注意到。

當俄國立憲民主黨及克倫斯基大舉攻擊布爾塞維克時——特別從一九一七年四月起，一九一七年六月七月更甚——他們替布爾塞維克人，‘加鹽調醋’，資產階級千百萬份報紙，唱起種種腔調，大罵布

爾塞維克人，幫助我們喚起羣衆去評判布爾塞維克主義；除了報章以外，全部社會生活也浸潤於布爾塞維克主義底討論，這不能不感謝資產階級之‘熱心’。現在各國的百萬富豪，在國際上也採取這種態度，使我們不能不對之心感。他們陷害布爾塞維克主義之熱忱，與從前克倫斯基輩無異，他們也和克倫斯基一樣的替我們‘加鹽調醋’，幫助我們。法國資產階級詭譎溫和或搖動的社會黨人爲布爾塞維克，布爾塞維克主義做成他們選舉煽動的中心。美國資產階級張皇失措，詭譎千數萬人有布爾塞維克的嫌疑，大肆逮捕，遍地製造布爾塞維克陰謀的消息，造成了人人自危的空氣。英國資產階級，世界上‘氣派最足’的這個資產階級，不關怎樣聰明和富於閱歷，也做出驚人的蠢事，設立了無數富足的‘反對布爾塞維克主義協會’，出版評論布爾塞維克主義的專門書報，展備無數學者，煽動家，牧師，去和布爾塞維克主義戰鬥。我們對於這些資本家先生們，真該深致謝忱，全身銘感。他們給我們效勞，幫助我們，令羣衆注意布爾塞維克主義之本質與意義的問題。他們本來也不能別樣做，因為要想‘塞住’布爾塞維克主義的口，窒死布爾塞維克主義，他們已醫辦不到了。

但是同時資產階級只看見布爾塞維克主義底一方面：暴動，強權，恐怖。因此資產階級盡力企圖，在這個範圍內，防衛抵抗。在某種情形下，在某個國家內，在某個短時期內，他們或許能够達到這個目的；這種可能，必須估計到，但對於我們，這點絕沒有什麼可怕。共產主義從社會生活底各部分上‘怒發出來’，真個遍地布滿了他底胎芽，‘傳染病’（這是資產階級最中意的名詞，最‘快心’的醫喻）已強有力地侵入機體，把全部機體浸透了。勞神焦思地‘堵住’一個出口，‘傳染病’又從另一個常常意想不到的口迸發出來了。生命走他自己的路。讓資產階級顧此失彼，怒火奔心，加鹽調醋，亂做蠢事；讓他先時報復，企圖屠殺十百千萬昨日的明日的布爾塞維克（在印度，匈牙利，德國等）：資產階級底行動，和歷史上注定滅亡的

一切階級，沒有兩樣。共產黨人須知，不論如何，將來勝利總是屬於我們的；因此我們能够（能且必須）把偉大革命鬥爭中最強烈的熱情，與對於資產階級昏亂現象底最冷酷最清醒的估計，融而為一。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殘酷地被撲滅了。俄國布爾塞維克在一九一七年七月鎮壓下去了。一萬五千德國共產黨人，因為率得曼，惱斯克們勾結資產階級和保皇黨的軍官，中了奸謀挑撥，被屠殺了。在芬蘭，在匈牙利，白色恐怖異常猖獗。但是在各種情形下，在各個國家內，共產主義都鞏固和茁長起來；他已經是根深蒂固，逮捕屠殺，不足使之衰弱，而反助其強大。祇要再加上一點，我們便可自信地堅決地，直取勝利；這點即在各國全體共產黨人，應該深思熟慮及覺悟，在策略上，應該要盡隨機應變之極致。這個怒發暴長的共產主義，目前特別在各個先進國內，缺乏這個覺悟，缺乏在實際中實解此種覺悟之能力。

那能學的馬克思主義者，投社會主義的第二國際底領袖們，如考茨基，奧陶，鮑宛，輩之遭遇，可以（而且必要）做很有益有教訓。他們的確覺悟隨機應變的策略之必要，的確學了馬克思底辯證法，而且轉教了別人（他們在這上面的供獻，有許多將永遠是社會主義書籍中有價值的作品）；但他們在應用辯證法時，便弄出這樣大錯，實際上或為非辯證論者。他們不懂得估計形式之俄頃萬變，不懂得估計新的內容怎樣迅速地充實舊的形式，於是他們底命運，遂與率得曼，葛得，普列哈諾夫，相差無幾。他們破產底根本原因，就在他們對於工人運動社會主義的發展，只‘注視’和一個形式，忘記了這個形式底片面不全，害怕去看那些因客觀條件而必然發生之急轉遽變，反覆地數說簡單的爛熟的一望了然的真理：三大於二。但政治雖似算術，尤似代數，更似高等數學；實際上，一切社會主義運動底舊形式，已全包涵了新的內容，數字前面，換上一個‘負的’新符號，但我們這些聰明的人兒，仍然（而且堅執地）自欺欺人地硬說‘負三’大於‘負

二。

我們要設法使共產黨人，不要從另一方面弄出同樣的錯誤，正確點說，‘左派’共產黨人從另一方面弄出同樣的錯誤，要趕快匡正，要迅速地痛苦較少地救治。不僅‘右派’的高論，即‘左派’的高論也是錯誤。目前共產主義內‘左派’主張底錯誤，自然比‘右派’主張（即社會愛國主義與考茨基主義）危險輕些小些；這個緣故，即在於‘左派’共產主義是很幼稚的剛剛發生的派別。正因為這個緣故，這個病症在某條件下容易救治，但必然要用全力去救治。

舊形式崩毀了，而事實底表現，新內容——反無產階級的，反動的內容——又達到了過度的發展。從國際共產主義進展底觀點上看來，我們已有這樣鞏固這樣強大這樣有力工作底內容（爲着蘇維埃政權，爲着無產階級專政），他們能夠而且應該表現於任何新的和舊的形式上，他能夠而且應該改造，戰勝，統轄，駕御一切新的和舊的形式；其目的並不是在於和舊的形式調和，而是要使一切舊的和新的形式，成爲共產主義完全的最後的堅決的必然的勝利之工具。

共產黨人要用全部力量去領導工人運動以及一般社會的發展，經過最直接的最迅速的途徑進到全世界上蘇維埃政權與無產階級專政底勝利。這是不可辯駁的真理。但是再往前多踏一小步——似乎仍照原來的方向——真理便變成錯誤。像德國的和英美的‘左派’共產黨人一樣，說：我們只承認一條骨直的路，我們不准有縱橫，彎的手腕，協商和妥協；這樣便是錯誤，云共產主義以嚴重的損失而且已予共產主義以重疊的損失了。‘右派’的主張，因只承認舊形式，不顧新內容，而全盤破產了。‘左派’主張也走內歧路，因爲他絕對否認一定的舊形式，而不見新內容已經過一切可能的形式迸發出來。他不知我們共產黨人底任務，是在能駕御一切形式，以最大的速度，把一個形式，補充別個形式，把一個形式代替別個形式。務使我們底策略，能適應於每個非爲我們階級，非爲我們努力所引起的變化。

世界革命，已因帝國主義世界大戰之恐怖，下流行爲，與悽慘狀況，而洶湧奔流，奮往前進。這個革命，在範圍和深度上，發展得這樣的迅速，具有這樣豐富的形式之變化，供獻這樣顯豁地揭破清談主義的論證，使我們可以希望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能把“左派”共產主義底幼稚病，很快地完全醫治好。

列寧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完稿。

補 遺

當我們國內（仇視無產階級革命的全世界帝國主義者，對於俄國無產階級恨入骨髓他們把對於本國工人所說的約言，棄置不顧，而繼續打劫和包圍俄國）底印刷局，尚未把我底小冊子印好出版，從外國又到了些補充的材料。對於這些材料在我這本小冊子內除作些輿論家的草草評論外，再無別的奢望，因之祇簡單的提到幾點。

1 德國共產黨人底分裂

德國共產黨人底分裂，已成事實了。“左派”即“原則上的反對派”已另組‘共產工黨’，以示別於‘共產黨’。在意大利也好像要到分裂的地步——我說‘好像’，因為在我所得到的左派蘇維埃報的下面幾號上（II Soviet 第七，八號）公開討論分裂之可能與必要，同時也提到‘反對參加議會派’底大會；這派直到現在還是屬於意大利社會黨的。

恐怕‘左派’即‘反議會派’（一部份是反對政治，反對政黨，反對職工會工作的）之分裂，如我們和‘中央社會黨’（考茨基派朗基派，‘獨立工黨’等）的分裂一樣，將成爲國際的現象。讓他去，分裂總比混亂好些；混亂會阻礙思想的理論的革命的發展，阻礙黨底成熟，阻礙黨內一致的真正有組織的真正準備無產階級革命的實際工作。

讓‘左派’在國內在國際上親身經一番，讓他們沒有嚴格集中的和具有鐵的紀律底黨，沒有駕御各地各部各項的政治與文化工作的能力，而去準備（并要接着去實現）無產階級專政。實際的經驗會很快地教訓他們。

工人運動內一切忠實主張蘇維埃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的份子，在最近的將來，一定要融合成一個統一的政黨：現在，我們就祇要竭盡全力，使‘左派’的分裂，不至妨礙或很少妨礙這種融合。俄國布爾塞維克的特別好運，就是他們遠在進行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羣衆爭鬥前，已對孟塞維克（這即是機會主義者與‘中央社會黨人’）和左派作過十五年有系統的徹底的爭奮鬥。現時在歐洲和美國，也要‘加緊腳步’地進行同樣的工作。幾個人，特別是那些圖當領袖而失敗的人，儘可（如果他們不以無產階級紀律自繩，不‘光明正大自處’）長期地知過不改，招工人羣衆，當時機一行成熟，便會迅速地容易地自己聯合起來，把一切正直的共產主義者聯合起來，成爲統一的黨，以實現蘇維埃政權與無產階級專政。〔註〕

〔註〕關於將來‘左派’共產黨人，反對議會派與一般共產黨人聯合底問題，我願提到一點。據我所得到的德國‘左派’共產黨人底報紙，和所認識的一般德國共產黨人看來，‘左派’有一番長處，就是他們在羣衆中比較平常共產黨人善於煽動。這點，我在布爾塞維克黨史中，也屢次看到——不過範圍較小，祇在幾個地方組織內，沒有遍及全國。例如在一九〇七——一九〇八年間，‘左派’布爾塞維克，在有些地方，常時比我們更有效地煽動羣衆。這上面一部份是因爲在革命時期，或革命的回憶尚歷歷在目時，拿‘簡單的否定’的策略，容易接近羣衆。但這還不能證實這種策略底正確。無論如何，一個共產黨人，要想在事實上做革命無產階級底先鋒，要想領導廣大的勞動和被剝削的羣衆，不僅無產階級的，而且非無產階級的羣衆，那麼就應該能够最

淺近，最通俗，最明瞭，最生動地，在城市裏工廠裏棺材裏，去宣傳，組織和煽動，這是毫無疑義的。

2 德國共產黨人與獨立黨人

我在這本小冊子內，曾發表過意見，說共產黨人和獨立黨左派間的一種妥協，是必要的，是有利於共產主義的；但要加以實現，却不容易。接着收到的報紙，把這兩種意見全證實了。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德國共產黨（斯巴達團）中央機關報紅旗報第三十二號上，載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對喀普，呂特維次‘政變’及‘社會主義政府’問爾底‘宣言’。從基本的前提上看來，從實際的結論上看來，這篇宣言都完全是正確的。基本的前提是：因為‘城市工人底多數’尚追隨着獨立黨人，所以這時無產階級專政底‘客觀基礎’尚未成熟。結論是：聲明對於‘排除資產階級政黨之社會主義政府’，保持‘忠耿的反對派’的地位（意即‘放棄武裝奪取政權’之準備）。

基本上、這個策略，無疑地是正確的。我們固然不願在字句上吹毛求疵，但有些地方却不能含默過去。要知社會主義叛賊們底政府，決不稱爲“社會主義的”政府（在共產黨底正式宣言內）。率得曼及考茨基，克里士品們的政黨，既是小資產階級民主的政黨，所以也決不能說甚麼排除‘資產階級政黨’的話。此外更不該寫出像‘宣言’第四條上這樣的話：

“……爲繼續引導無產階級的羣衆使之轉向共產主義方面起見，那底下述的情形，在無產階級專政發展的觀點上看來，是非常重要的；這種情形即是：政治的自由，可以無限制地利用，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不復能成爲資本底專政……”

這樣一種情形是不可能的。小資產階級的領袖，德國的亨得孫們（率得曼）司惱登們（克里士品）不會跳出也不能跳出資產階級

德謨克拉西底範圍；這種德謨克拉西，本身與資本的專政，絲毫無殊。像這樣根本錯誤而在政治上有害的東西從獲得實際效果的觀點上說來（德共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正在正確地求得這個效果），可以絲毫用不着寫。為獲得實際效果起見，只要這樣說就夠了（如果要用議會式的客套）：城市工人底多數，既然還是跟隨獨立黨人，我們共產黨人，便不能不讓這些工人，用“他們自己”政府底經驗，打破他們最後的市井小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的（這也是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的）幻想，這樣就足以使妥協有充分的根據。這個妥協在事實上是必要的。妥協底內容是：我們暫時放棄以武力推翻多數城市工人所信賴的政府之這種企圖。至於在日常羣衆的煽動中，我們不受這樣議會的客套底拘束，自然可以加上：看牽得曼們這些混蛋，考茨基，克里士品們這般學究，在實際中揭破自己怎樣的自欺欺人，他們“清一色”的政府，將“最清潔地”把什麼社會主義的社會民主主義的以及叛賣社會主義的形形色色廢棄，‘打掃’淨盡。

‘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目前領袖（這些領袖，有人說他們底作用已經喪失，那是不對的；在實際上，他們對無產階級，要比那些自命共產黨人的，答應‘擁護’無產階級專政的匈牙利社會民主黨人更危險得多）之本來面目，在德國的考尼洛夫式事變中（即是說在喀普，呂特維次底政變中）（註）已屢次暴露。一個簡短明瞭的證據，便是加爾考茨基大作，千鈞一髮之際（獨立黨機關報自由，一九二〇年，三月，三十日）和何爾托，克里士品底大作論政局（自由，一九二〇年，四月，十四日）。這些先生們絕對不能如革命家這樣的思索論斷。這是多愁善泣的市井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如果他們自命為蘇維埃政權與無產階級專政底信徒那麼他們對於無產階級的危險，將更增加千百倍，因為事實上他們在每個困難和危險的當兒，必然要作叛賣的行爲……但他們却再‘誠心誠意’沒有地自以為是在幫助無產階級！看，變名為共產黨人的匈牙利社會民主黨人，當卑怯游移，以為匈

牙利蘇維埃政權之地位無望，而伏地涕泣於協約國資本家劍子手底走狗之前時，也是要‘幫助’無產階級呵。

〔註〕這次政變，在奧國共產黨出色的機關報上，也異常明瞭簡短翔實地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列過（紅旗報，維也納，第二六六至二六七號，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八日，三十日；德國革命底一個新篇章。）

3 意大利之屠拉第輩

上面提到的幾份意大利的蘇維埃報，完全證實了我在這本小冊子內所說的話。我指出意大利社會黨，容忍像屠拉第等這類黨員這般議員，是一種錯誤。旁觀的一個證人，更證實了這點；這人就是英國資產階級自由派報紙“The Manchester Guardian”駐羅馬的通訊員，他於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二月，在該報發表屠拉第底談話：

這位通訊員這樣的寫：“……屠拉第君認為，革命的危險，并不大到這個地步，使在意大利，招出無謂的驚慌。馬克西麻派（Maximalisten）玩弄蘇維埃學說底烈火，祇為着要捉高和激起羣衆底情緒。不過這類學說，純粹是海外奇談，不成熟的綱領，實際上毫不中用。他們攔住勞動羣衆使之停於期待的狀況中，而用以自傲。在他們拿上述學說做香餌，去眩惑無產者時，他們不得不進行日常的爭鬥，獲得一些微末的經濟上的改良，以遷延日子，好教工人階級不至失掉他們底幻想與對於他們得意神話的信仰。由此就生大大小小輕舉妄動的無數罷工以至最近郵政鐵路罷工，——這些罷工，真使團內的情形，難上加難。因亞得利亞海問題而發生之糾葛，使國家震撼，外債和紙幣的濫發，使國內情形，日趨困迫；但是國內却還不自覺有採用勞動紀律之必要，唯有這箇勞動紀律，能够恢復秩序，重建太平。……”

這段實話，明明是屠拉第自己及意大利之資產階級辯護士幫手軍

師等所隱匿飾住的，却被英國的訪員，盡情說出。真的，居拉第，特利文（Treves），毛底連尼（Modigliani），杜哥尼（Dugoni）這類先生們之理想及政治工作，和英國訪員所描寫的，恰好一樣。這是激頭激尾的叛賣社會主義。在僱用勞動的奴役下替資本家生利潤的工人，僅擁護秩序與紀律有何好處！我們俄國人，何等耳熟地聽慣這種孟塞維克的演說，他們承認羣衆贊成蘇維埃政權，這是何等有價值的承認。他們對於自發的罷工運動之革命作用，絲毫不懂，是何等純拙，何等資產階級的庸俗！是呵，是呵，英國資產階級自由派報紙底通訊員真替居拉第先生們效了一番蠢勞，出色地證實了保爾底加 Bordiga 同志及其友人在蘇維埃報中提出的要求之正確。他們的要求，就是意大利社會黨倘要實際上贊成第三國際，那麼，非把居拉第這類先生們痛罵趕出黨去不可；這樣，方使他不僅在名義下，而且在實際上成爲共產黨。

4 正確的前提，錯誤的結論

但是保爾底加同志和他‘左派’的友人，却從正確的對於居拉第先生們所作的批評中，引伸出錯誤的結論，以爲凡是參加議會，都是有害的。意大利‘左派’并無絲毫鄭重的論據，可以自圓其說。他們簡單的不知道（或企圖忘記）真正革命的，共產主義的，無疑地利於準備無產階級專政的，利用資產階級議會底國際模範。他們絕不領會‘新的’，只是高聲大，沒有休止地重複說甚麼“舊的”非布爾塞維克主義的議會政策之利用。

這裏正是他們底根本錯誤。共產主義不僅應該在議會內而且應該在一切社會活動上，把原則上新的，徹底和第二國際傳統決裂的（同時第二國際所給的好例子我們應保留下去發展下去）東西，灌注進去（但沒有長期堅忍的工作，這點決不能做到）。

拿新聞事業來說罷。報章雜誌，傳單宣言，進行必需的宣傳，煽

動，組織之工作。沒有新聞事業的機關，在一個稍具文明的國內，便做不成羣衆運動。儘你責罵“領袖”，儘你發誓保證羣衆不受領袖底影響，但終不能使我們可以不必利用那些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出身的人物，以進行我們這種工作，終不能把我們從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的“私有制度”的空氣和環境內，解放出來；須知資本主義存在一天，我們底工作便一天要在這種空氣和環境內進行。就是在俄國推翻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奪得政權已二年有半，但我們還看着這種空氣，這種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私有財產關係（農民與手工業者）的環境包圍着我們。

議會政策是工作之一種形式，新聞事業是另一種形式。只要在這兩部門工作的人材，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是無產階級羣衆黨底真正黨員，則二者之內容，可以成爲共產主義的，而且必須成爲共產主義的。但是不論在這一部門或那一部門的工作內，——並且在資本主義下，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期間，無論在那種工作上，——無產階級都不應躲避那些困難及那些特殊的任務，而應該加以打破和解決，利用那些從資產階級環境中產生出來的智識分子，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來戰勝資產階級智識分子的成見和影響，來減少小資產階級環境的阻力（將來還要根本加以改造）。

我們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大戰以前，在一切國家內，難道不會看到無數的例子麼？！那些很“左的”無政府主義者，工團主義者，怎樣痛罵議會政策，怎樣嘲罵被資產階級所腐化的社會黨議員怎樣“擊斃利行爲等等……而自已却借着新聞事業，借着工會工作，去做一樣的資產階級的賁緣勾當？！如就法國來說，朱敖（Jouhaux），梅爾亥姆（Merrheim）這些先生們底行動，難道不是出色的例子麼？！

這就是爲什麼“拒絕”參加議會，是一種幼稚病。他們自以爲用這樣“簡單”“輕便”似乎革命的方法，可以“解決”在工人運動

內部反對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影響底困難任務；而事實上却是顧影却步，閉起眼睛，不看目前困難，只用空話卸脫這種困難。最無恥的貪絲勾當，資產階級對於議席之利用，議會工作之破天荒的改良主義化，無恥的市井小資產階級的慣習，——這些東西，毫無疑義地全是資本主義所產生的和遍布的特徵；他不僅存在於工人運動以外並且還存在於工人運動以內。資本主義及其所造成的資本主義環境（這環境就是在推翻資產階級之後，也消滅的很慢，因為農民，不斷地在製造新的資產階級），必然在一切工作內生活內，產生形式上少有分別，而實際上大略相同的資產階級的貪絲勾當，民族愛國主義和市井小資產階級的卑污行爲等等。

親愛的抵制派和反議會主義派呵，你們自己覺着‘驚人地革命’，但事實上你們在反對資產階級在工人運動內的影響底鬥爭中，却被較小的困難所驚倒；要知你們底勝利（推翻，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將產生同樣的困難，困難底規模，將更擴大，並且無限地擴大。和小孩一般，你們被目前的小困難驚倒了，不應得明天後天你們尚須學習，尚須學習到底，去打破那種同樣的而規模不知大得多少的困難。

在蘇維埃政權之下，還有更多資產階級的“智識分子”鑽入你們和我們底無產階級的政黨裏來。他們將鑽進蘇維埃內，鑽進法庭內，鑽進管理機關內，因為我們只能用資本主義留下的‘人間的資料’去建設共產主義，我們不能把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趕盡殺絕。我們要把他們戰勝，改造，磨礱，重新訓練，——好像在無產階級專政底基礎上，用長期的鬥爭，以重新訓練無產階級本身一樣。無產階級想解脫自己的小資產階級成見，不是一下便行，不是用甚麼神通法術，聖母勸命也不是用口號，決議，指令底訓諭所能得到的；只有靠長期艱苦的羣衆鬥爭去反對小資產階級的羣衆影響才行。現在反議會派如此矜矜地如此高昂地如此輕率地如此兒戲地欲一揮而去之任務這種同樣的

任務，將在蘇維埃政權下重新生長的蘇維埃內部，蘇維埃管理機關內部，蘇維埃‘法律援助團’內部（我們在俄國打破了資產階級的律師制——而他又托生於‘蘇維埃’‘法律援助團’）。在蘇維埃工程師中間，在蘇維埃教育家中間，在蘇維埃工廠內技術好位置好的工人中間，我們可以看到資產階級議會制度所固有的一切壞處，不斷地復生。我們只有用無產階級的組織和紀律，用再接再厲長期艱苦的鬥爭，方能漸漸戰勝這種惡毒。

自然在資產階級的統治下面要戰勝自己黨內即工人黨內資產階級的習慣，非常“困難”。要把那同流合污，被資產階級成見腐透了議會主義的領袖趕出黨去，“難”；要使那絕對必要的（即令這種必要的分子很有限）而是資產階級出身的分子服從紀律，“難”；要在資產階級的議會內建立真配得上工人階級的共產黨黨團，“難”；要使共產黨議員不鬧資產階級議會的兒戲，而致力於羣衆中宣傳，煽動組織底迫切工作，“難”凡此皆“難”，用不着說，從前在俄國難，而今在西歐和美國更難；因為在西歐，美國，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德謨克拉西的傳統等等，都特別的厲害。

但是這些‘困難’，若與無產階級革命期內以及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無產階級爲獲得勝利計所必需解決的任務比較起來（這些任務與上述困難，性質完全相同），則直易如兒戲，同這些真正偉大的任務比較起來，譬如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必須重新教育那千百萬農民，小有產者，數十萬雇員，官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要他們統統服從無產階級政府，順受無產階級的領導，要戰勝他們資產階級的習慣和傳統——同這般偉大的任務比較起來，則在資產階級統治下，在資產階級的議會內，建立真正無產階級政黨底一個真正共產主義黨團，直是一樁易如兒戲的事情。

如果‘左派’及反議會主義派的同志們，連現在排除這種小困難的事都不學習，則我們可以堅決地說，他們將來或是不能實現無產階

級專政，不能大規模地支配及改造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和產階級的機關，或是必須把這些事情，很倉卒地學習一下，但因為倉卒之故，必予無產階級事業以巨大的損失，做出更多的錯誤，暴露更多的弱點和缺乏能力等等。

只要資產階級一日未推翻，只要小經濟，小商品生產一日未消滅，則資本主義環境，私有制度底習慣，市井小資產階級的傳統，必然在無產階級運動底內部和外部，妨害無產階級的工作。不僅在議會活動上如此，而且在一切的社會活動上，在一切政治，一切文化的場合上也必然是如此。在某種工作上，遇着一樁‘不舒服的’任務或困難，便想畏難偷安，抽身迴避，這是絕大的錯誤，將來一定要償付更高的代價。應該學習，應該學會怎樣駕御一切工作活動，在各處各地戰勝一切困難，以及一切資產階級的陳例，傳說，和習慣。除此以外，對於這問題的別個立場，都簡直不鄭重，都簡直是兒戲。

第三章的幾個註釋

第二次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大會（黨創立於一八九八年的第一次大會）在一九〇三年開於倫敦。這時候，因關於黨章第一條的爭論，黨分裂成兩派：多數派（布爾塞維克）承認“火星”（“Iskra”）的傳統，少數派（孟塞維克：馬爾托夫，托羅茨基，阿克塞爾洛特 Axelrod，不久以後普列哈諾夫等）反對這個傳統，而且奪取了“火星”報（因此，從這時候起，稱為“新火星”）。一九〇五年獨立的布爾塞維克大會，即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第三次大會，召集了。在革命期間兩黨合併：一九〇六年在瑞典京城 Stockholm 開聯合大會；但布爾塞維克保持牠的獨立性。以後還開過一次共同的大會（倫敦，一九〇七年），可是，一九一二年徹底地分裂了。一九一三年議會黨團（Duma-Fraktion）分裂了。在一九一八年第七次的大會上，改名為俄國共產黨（布爾塞維克），在第八次大會（一九一九年）通過了一個新的黨綱。

“列納事件”（Ergebnisse Lenagebiet）是指西伯利亞列納

河畔的金鐵場中的慘殺工人事件。

“工人選舉場”是劍子手斯託利平（Stolypin 他是俄皇的內閣總理，一九一一年在基夫 Kiew 爲一偵探所殺）底發案。最初的兩次議會（社會民主黨員沒有參加）底構成，不合反動派的口味，斯託利平便發布“六月三日的法律”，來改變選舉法。這是一種極惡劣的，極複雜的，極間接的選舉法。在彼得堡，莫斯科，柯斯特洛麥（Kstroma），佛蘭及密爾（Wladimir），哈爾柯夫（Charkow）等六州，施行了三級制的選舉法。工人先在特別的“工人選舉場”選出他們的候選人，然後將這些候選人送到州底一般的選舉所去。在這個州底選舉所裏每州應選出一名工人議員，其餘則盡歸於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在第三次議會（一九〇八）和第四次議會（一九一二）的選舉中，布爾塞維克在這六個工人選舉場得了勝利，送了六個議員到議會去。在別的各州（四十個以上）工人事實上沒有選舉權。第四次議會中的六個布爾塞維克議員，是麻拉可夫（Marakow），彼得羅夫斯基（G. Petrowski），謝哥夫（S hagow），巴達葉夫（Badajew）和巴摩以羅夫（Bamojilow），還有偵探馬利諾斯夫奇（Malino-wski），這個偵探在一九一四年十一月的一個秘密會議上，把這個黨團都逮捕了，這些議員與指導這個黨團的卡米涅夫（Kamenew），一同被流放到西伯利亞，一直到一九一七年的革命時爲止。

孟塞維克因爲與小資產階級成立選舉的妥協，所以在全高加索的工人選舉場及邊境的諸州，得到了他們的議員（其中有宰萊台里 Zeretelli，且夷之，Jscheidse，及該該取柯里 Gegetschkori）。

第三章的末尾還有註釋的必要。那裏所討論的問題，是一九一七年三月至十一月間的布爾塞維克底策略。蘇維埃產生於一九〇五年（一九〇五年成立彼得堡工人代表蘇維埃，委員長爲克魯斯達列夫 Chrustalew——在運動失敗後即消滅跡的無用的人物——次之，爲崑洛茨基，巴爾福斯 Parvus），“在一九一七年二月與十月之間”

(依舊俄歷。舊歷比新歷遲十三天，所以十一月七日的革命照舊歷爲十月二十五日，故稱爲十月革命)蘇維埃爲孟塞維克所欺騙了。這就是說，那時蘇維埃由鬥爭的機關，轉變爲迎合立聯政府的機關。七月(這時候，克倫斯基與聯合政府已準備了對於布爾塞維克的虐殺)以後，列甯撤回“一切權力歸蘇維埃”這個口號，因爲當時的蘇維埃，都已是妥協的了。因爲蘇維埃是代表勞動民衆的大多數，所以蘇維埃自身(牠在事實上，并不像一個議會，牠是代表勞動民衆的大多數的)沒有變更牠的見解的時候，布爾塞維克就不提出打倒聯合政府的口號。當布爾塞維克在彼得堡及莫斯科的工兵代表蘇維埃佔了大多數的時候，而且在十一月七日所召集的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明白地佔了多數的時候，不消說這個策略也變更了。(關於這點，參照列寧的重要論文：“兩個政權”“論策略書”，及有名的四月提綱)。

* * *

在第四章所述的“議會”，即所謂布利金議會 (Bulyginsche Duma)，是一種純粹的欺騙舉動。布爾塞維克抵制了這個議會，這樣使這議會完全不能成立，因爲一九〇五年十月的總罷工，使俄皇不得不頒部創立真正議會的1月十七日(舊歷)的宣言。

對於第一次議會，布爾塞維克，波蘭及拉脫維亞的社會民主黨，甚至社會革命黨，都不客氣地抵制了。孟爾塞克事實上也抵制了，可是祇在“第二級”才這樣做(選舉權是間接的)。對於第二次議會，列寧主張要參加選舉，黨內(“兩派聯合的黨”)底布爾塞維克派經過了一些反對後，也承認了。

* * *

第五章所講的俄國共產黨第九次大會，是在一九二〇年初頭開的；所說的反對派是指“民主集權主義派”(薩普羅諾夫 Sapronow, 奧辛斯基 Ossinski)。這一派到第十次大會(一九二一年)還存在，同時，其他反對派別(托洛茨基派，布哈林的緩衝派，勞動反對派等

等)，利用職工會問題的討論（托羅茨基主張職工會“國家化”，勞衛反對派主張職工會“應從官僚的即黨的影響之下解放出來”）提出了對於黨的多數（以列寧為首領）的聯合的反對。列寧堅持自己的立場，指示了各個反對派之社會根基，以極堅決的態度貫徹了對於各個反對派的鬥爭。

人名索引

Adler, Friedrich (阿得來)；奧大利社會民主黨的首領。戰時暗殺了內閣總理施丟爾格 (Sturghk)，為的是要得到一個機會，使工人知道奧大利社會愛國主義者底背叛；但戰後一出獄，便回到同一社會愛國主義的黨裏去了。他是第二半國際的創立者；這個國際是為愚弄革命工人，阻止他們加入共產國際而創立的。一九二二年，第二半國際與第二國際合併後，他在倫敦做了社會愛國主義國際底執行委員，一九二四年辭職歸維也納。

Adler, Viktor；阿得來之父，奧大利社會民主黨創立者之一。大戰中成為社會狹義愛國主義者 (Sozialchuvinist)。死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

Asquith (阿斯奇士)；英國自由黨的老領袖。大戰中，自由黨分裂為“國民自由黨”(或聯合自由黨，因牠與保守黨成聯合內閣)與舊自由黨。阿斯奇士仍留在舊自由黨，而勞合喬治則為國民自由黨的首領，且為內閣總理，戰後兩黨又合併了。一九二四年十月阿斯奇士

失敗於下院議員的選舉。一九二五年初被封爲伯爵，入上院，在政治上已不起作用了。

Austelitz（奧斯特利慈）；社會民主黨的維也納勞動新聞底編輯。大戰中是一個最激烈的社會愛國主義者。

Axelrod, paul（阿克色爾洛特）；俄羅斯社會民主黨底創立者之一。與普列哈諾夫，匯拉薩蘇利赤（Wera Sassulitsch）同屬於“勞動者解放團”（一八八三年創立）。這個團體對於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的聯合，是很重要的。他與普列哈諾夫，薩蘇利赤，列寧，馬爾託夫，波特列梭夫（Potressow），德以志（L. Dootsch）等同爲“火星”報的編輯。在黨第一次大會（一八九八年）以後，從一九〇一到一九〇三年，舊“火星”報對於黨的組織是有根本的意義的。在一九〇三年倫敦第二次大會黨分裂爲布爾塞維克（多數派）及孟塞維克（少數派）時，他與孟塞維克取同一行動，以後就一直爲孟塞維克。

Babuschkin（巴佈什金）；一個彼得堡的革命工人，布爾塞維克的鼓勵家與組織家。一九〇六年爲憲兵所殺。

Bauer, otto（鮑宛爾）；奧大利社會民主黨人，第二半國際的理論指導者，後來又是第二國際的理論家。一個考茨基派。

Bebel, August（柏柏爾）；與威廉李卜克內西（Wilhelm Liebknecht）一樣，是一個戰前社會民主黨底偉大的有人望的指導者。一九一三年死。

Bernstein, Eduard（伯恩斯坦）；第二國際的老黨員。馬克思恩格斯底直接的弟子。恩格斯死後，他修正了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底諸前提”一八九九年），因而一種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進化學說”也產生了。他爲一切的馬克思主義者（普列哈諾夫，考茨基，葛德 Guesde，列寧，盧森堡，梅林 Mehring，巴爾福斯 parvus）所猛烈攻擊。我們可以說他的理論，現在已經徹底地浸透了第二國際的機

體。

Blanki, Louis Auguste (勃蘭基)；生於一八〇五年。一八三〇年巴黎卷戰的戰士，因為他是“人民之友”報的編輯，所以被宣告死刑，但沒有執行。一八三六年，因火藥製造罪，被處兩年的徒刑。一八四〇年，以暴動未遂罪又受死刑的宣告，後減罪一等為終身監禁，一八四八年革命，因被赦免。共和國的裁判，又把他當作謀叛人而處以十年的監禁。因企圖逃走未遂，被流放到科西加 (Korsika)。一八五九年特赦，一八六一年因秘密結社受四年監禁的宣告。一八七一年被舉為公社 (Commune) 的委員，但為契愛爾 (Thiers) 所幽禁。一八七二年新共和國又把他放逐於殖民地。一八七九年被舉為國會的議員，但又受選舉無效的宣告。然又被赦。勃蘭基的意見，稱為布蘭基主義。他不顧力量如何，總是企圖叛亂暴動，但這個方法，完全是無效的。反之，勃蘭基個人是最誠實最勇敢最剛強的革命戰士。

Bordiga, Amados (波爾蒂加)；意大利左派共產主義者，戰後成立意大利社會黨內的左派。一九二一年在利和爾諾 (Livorno) 分裂後，他為意大利共產黨的首領。

Bucharin, Nicolai (布哈林)；布爾塞維克黨員，戰後，俄國共產黨及共產國際的指導人、理論家，俄國共產黨的中央委員，俄共產黨中央機關報 (真理 Prawda) 的總編輯，共產國際的執行委員。一九二八年末以來，犯右傾錯誤，脫離上述工作。

Churchill, Winston (邱吉爾)；英國的鐵官主義者。從保守黨轉到自由黨，又入國民自由黨，一九二四年復歸保守黨。他不但把持了下院，且為鮑爾溫，張伯倫內閣的財政大臣。

Clynes (克萊因斯)；英國工黨黨員，社會愛國主義者，一九二四年麥克唐納內閣的大臣。

Crispien, Arthur (克里斯品)；德國社會民主黨員，獨立社

會民主黨的首領，後爲德意志社會民主黨的首領。

Denikin (丹尼金)，俄皇的將軍。一九一七年九月康尼洛夫 (Konrilow) 暴亂的共謀者。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一九年爲法國的金錢所買收的白黨軍隊的組織者。這個軍隊佔領烏克蘭 (Ukraine)，進兵到歐萊爾 (Orel, 離莫斯科不遠)。(這個時候，猶登尼赤 (Judenitsch) 的白軍也進到離彼得堡五六公里的地方，考爾察克 (Koltshak) 列陣於伏爾加 (Wolga)，但結果失敗了。丹尼金殘餘軍隊，轉成佛蘭格爾軍隊 (Wrangel Armee) 進兵利克林姆 (Krim))。一九二〇年終完全失敗了。

Dietzgen, Józef (狄慈根)；無產階級出身的唯物論哲學家；他自稱爲馬克思的學徒。他的體系不是徹底的馬克思主義 (主要著作：“人類頭腦勞動的本質”)。

Dreyfus, (德萊菲)；法國的上尉。因偏狹的反色姆族的王黨官吏及政治家，捏造文書，加以德探的罪名，所以在一八九四年被放逐於惡魔島 (生胡椒的開埃奴 Cayenne)。數年後，偉大的法國小說家左拉，社會主義者喬列斯 (Jausès)，著作家法蘭斯，及著作家同時又是政治家克勒曼梭 (Clemenceau) 等，揭穿了這個事件，因此，共和政府的腐敗被暴露，這事件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因而在法國增大了“公共的熱情”(即社會的反抗)。

Dugoni (杜哥尼)；意大利達拉哥納派 (Daragonagruppe) 的最右的改良主義者。

Gallacher, W (喀拉歇爾)；蘇格蘭的共產主義者。

Gompers, Samne (郭朋司)；三十九年美國勞動組合聯合會的會長。社會帝國主義者，黃色工會的首領。“市民聯盟”(Civic Federation) 底副總理，這個聯盟的正總理是莫爾根 (Morgan)——世界的銀行家。郭朋司死於一九二四年末。他是格拉斯曼 (Grassmann) 萊佩爾特 (Leipert) 這樣的德國工會首領所欽仰的人。

物。

Guesde, Jules (葛德)；法國社會主義的首領，正統馬克思學派的理論家。他對於修正學派和米爾蘭學派 (Millerandismus, 即聯合政策，更確切點說，總長交椅的追求政策) 鬥爭，對於米爾蘭 (Millerand, 現在法國國家主義者的首領) 及喬萊斯 (一九一四年大戰前夜被殺) 鬥爭但葛德不知道將這個鬥爭拿到羣衆中間去，不知道使大衆理解這種鬥爭。他對於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鬥爭，在當時是值得稱讚的。他在政治立場上及理論上，越發表示了“極左的、偏向與辯論的過激主義，因而越發離開了羣衆。世界大戰暴發後，他便急劇地轉變，做了大臣，死於一九二二年。

Henderson, Arthur (亨得孫)；英國工黨的首領，社會愛國主義者，英國戰時內閣的大臣，麥克唐納內閣的內務大臣。

Hifferding, Rudolf (希爾菲丁)；“金融資本論”及其他許多馬克思主義書籍的著者。獨立社會民主黨的首領，後爲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首領。站在最右派。希爾菲丁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內，是少有的聰會的人物，他的“平和主義”的“理論”，是對於工人的欺騙。一九二三年，爲斯特列色曼 (Stresemann) 聯立內閣的閣員。他是一個熱心的對於共產黨人的迫害者和殘殺者。

Hoglund, Zeta (海格龍特)；大戰時瑞典的青年社會主義者。他在議會中勇敢地反抗社會愛國主義。因而被壓禁 (常被稱爲瑞典的李卜克內西)。齊墨凡爾特 (Zimmerwald) 的代表。後爲瑞典共產黨的首領。趨於右派。一九二四年被開除。一九二四年他與他自己在大戰時所攻擊的“極右的”布蘭庭社會主義者 (Brantingsozialalisten) 締結選舉同盟。

Horner (霍奈爾)；郭泰 (Hermann Gorter) 而假名。荷蘭的馬克思主義者，大戰時嚴格的國際主義者 (列寧時常引用他)，他後來與潘納可克 (Anten Paunekoek) 同爲“荷蘭的左派”，潘氏會

爲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的理論家，——因他們出版“論壇報”（De Tribune）所以被稱爲“論壇派”。霍奈爾後爲德國共產勞動黨的理論家。

Hyndman（海得曼）；英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戰時變爲社會愛國主義者。

Inkpin（應克平）；英國共產主義者，前英國共產黨書記。

Jouhaux（朱敖）；法國（改良主義的）工會聯盟的會長。戰前雖是“極左的”無政府工團主義者，但在戰時變成了社會愛國主義者。現在是法國的列金（列金Legien是德國的郭朋司，像郭氏爲莫爾根所珍重的一樣，他也爲德國大資本家斯丁尼斯Stinnes所珍重）。

Judenitsch（猷登尼赤）；俄皇的將軍，白軍的指揮官。一九一九年被敗於彼得堡郊外。

Kapp（卡普）；東普魯士的反動派，戰時大日耳曼主義者。一九一九年三月與呂特威慈（Luttwitz，威廉皇帝及諾斯克Ncske的將軍）埃爾哈特（Erhardt，威廉的上校，諾斯克的腹心）魯登道夫（Lndendorf）等舉行叛亂；爲工人所驅逐，逃於瑞典。一九二二年返德醫自疾，因手術而死。

Kautsky, Karl（考茨基）；第二國際的理論家，恩格斯學徒。“新時代”（NeueZeit，從一八八七年到一九二四年止爲德國社會民主黨底理論機關報）的編輯，德國社會民主黨埃爾夫特（Erfurt）綱領的起草者（一八九一年）。他曾攻擊過伯恩斯坦的修正派學說，但現在他自己也變成伯恩斯坦派了。

Kerenski, Alexander（克倫斯基）；律師，典型的政治的獵官者。第四次議會的議員（小資產階級的“勞動團”的會員），社會愛國主義者。帝制崩毀後，他違反彼得堡蘇維埃的意志，加入聯立內閣爲司法總長後爲陸海軍總長（公然爲王黨古契可夫Gutschkow的後繼者）。遵英法商會的命令，於一九一七年六月攻擊布爾希羅夫。

Brussilow)。他與六日舉行暴動的俄皇將軍康尼洛夫 (Kornilow) 秘密結合，然見事不成，便背叛康尼洛夫。以後他越發陷於誇大的妄想，自命爲小拿破崙。十月革命，把這個虛榮心強而能力薄弱的饒舌家驅逐了。

Koitschak (考爾察克)；俄皇的海軍提督，十月革命後白軍的指揮官，在被法國羽翼之下自稱爲俄國的“攝政王”。一九一九年敗於赤軍，投獄，一九二〇年被處死刑。

Kornilow (康尼洛夫)；俄皇的將軍，一九一七年恢復軍隊內的“秩序”，而舉行暴動。他雖然與克倫斯基政府有密約，但爲工人所敗。

Lansbury George (蘭斯盤雷)；英國和平主義的左派工黨黨員。

Lauffenberg, Heinrich (勞芬伯)；戰前漢堡社會民主黨員，後爲共產主義者。他與烏爾夫翰 (Fritz Wolffbeine) 及勒勤 (Otto Ruhle) 等在一九一九年十月德國共產黨海得山 (Heidelber) 大會中領導了反對派。在這個大會上，黨因工會問題及參加議會問題上的爭執而分裂了。他們後來組織共產勞動黨 (K. A. P.)。這個黨又經過幾次的分裂，一九二一年以後，事實上已經消滅了。

Ledebour, Georg (列得保)；德國社會民主黨老黨員後爲獨立社會命主義黨員，他是一九二二年拒絕復歸於諾斯克 (Noske) 黨的少數獨立社會民主黨員中之一。殘存的極少數的 U. S. P. (聯合社會黨) 也把他開除了。他利用赤色 (大衆) 恐怖也是“非道德的”這個論據，來攻擊第三國際。他現在不諷罵共產主義了。

Legien, Karl (列金)；戰前戰時德國工會首領中最聰明的最販賣階級利益的一人。德國式的郭朋司。戰時社會愛國主義者。一九一八年革命三天以後，他與司丁尼斯創立了中央勞動團以作資本案破壞罷工的先鋒隊。死於一九〇二年。司丁尼斯 (現在也死了) 爲紀念起

見，特在“興登堡號”與“魯登道夫號”二船下水以後，添造一隻“列金”號。因此，司丁尼斯證明了德皇的社會民主黨員及工會將軍的列金，和兩個德皇的將軍一樣，同是德國帝國主義者底最強有力的支持者，最可信任的戰爭延長者。

Liebknicht, Karl (李卜克內西)；威廉李卜克內西之子。戰前他在社會民主黨內常站在左派，努力於領導青年進行反軍國主義的鬥爭。斯巴達克團(Spartakusbund)的創立者之一。大戰時，他在議會及法庭(即在一九一六年正月一日在波茨坦廣場的示威運動提出“防止戰爭”，“打倒政府”的口號以後)的勇敢的態度，是全世界革命工人的模範。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五日爲諾斯克，社會民主黨及政府腹心的帝政派白軍士官所處殺。

Lloyd, George (勞合喬治)；明白地帶了帝國主義色彩的英國自由主義者，與保守黨聯合的辯護者，狡猾的煽動政治家，強盜式的凡爾賽和約底起草者之一。就是在下院中崩壞了的自由黨的首領。

Longuet Jean (朗格)；法國社會民主主義。太戰中，與中央派(即帶了和平主義的考茨基派色彩而旗幟不鮮明的“國際主義者”)第二半國際，一同走到第二國際去了。他和萊諾台爾(Renaudel) 布留姆(Leon Blum) 亞爾培湯姆(Albert Thomas) 一樣，同是社會愛國主義黨的首領。朗格是馬克思的外曾孫，因而第二國際想利用這點，爲自己謀利益。

Luxemburg Rosa (盧森堡)；波蘭及立陶宛的社會民主黨的創立者。斯巴達克團及德國共產黨的創立者及指導者。第三國際底最有學識的馬克思主義者之一。她對於修正派及機會主義作最猛烈的鬥爭。她的最大功績之一，是她早就反對“正統派”的考茨基。她遺下了許多論文及著作。這些著作，還沒有受到有系統的批評。大著有“資本積集論”。她在德國促進了關於總同盟罷工的議論，作了攻擊米爾蘭主義的卓絕的論文，又起草了斯巴達克團綱領。她又給了波蘭共產

黨以理論及方針。大戰中，她因反對社會民主黨首領，致被告發而受監禁，她從監獄裏作“斯巴達信札集”。這在當時差不多是唯一的革命的著作（自然是祕密出版）。革命以後，被釋放，她以斯巴達克團及一九一八年創立的德國共產黨首領的資格，馬上起來站在鬥爭的前鋒。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五日，她與李卜克內西同為諾斯克手下的士官所屠殺。失去盧森堡與李卜克西，對於革命運動，是一個極大的打擊。

Mac Donad, John Ramsey (麥克唐納爾)；英國工黨獨立黨黨員。大戰中和平主義者。戰後為工黨的首領。“建設的”“社會主義”底代表，這個主義，主張不要什麼階級爭鬥，只要對於神恩的信仰以及對於資產階級底善心的理解。一九二四年，為內閣總理。他以這個資格，博得了最反動的英帝國主義者的無限的稱讚，因為他計劃了空軍及海軍的擴張，并以軍隊慘酷地壓迫了米索不達米亞的暴動。一九二九年，又繼保守黨起來執政。

Malinowski, Loman (馬利諾夫斯基；第四次議會的布爾塞維克議員，同時又是俄皇的祕密警察的偵探。一九一三年他到外國，成德國的俘虜。一九一八年返蘇維埃俄羅斯，付革命裁判，因其密探行為，被處死刑。

Martow, Julins (馬爾託夫)；第一流俄國馬克思主義者之一。一八九〇年在彼得堡與列寧同屬於一個團體，與列寧同時被流放到西伯利亞。一九〇〇年終，與列寧，普列哈諾夫，阿克色爾洛特，薩蘇理赤等，同為“火星”的編輯。一九〇三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大會中，為孟塞維克的首領。以後總是孟塞維克。大戰時，中央派（“左傾”中央派，但沒有托洛茨基這樣左）國際主義者。一九一七年四月與列寧，拉狄克同乘有名的“封印”火車，從瑞士到彼得堡對於一切問題，都取“左派”孟塞維克的地位，即“一方面……而他方面……”云云”這種的態度。一九二〇年移住德國，創立“社會主義專

報”因喉頭結核死。

Merrheim(梅爾亥姆)德國工團主義者(Syndicalist)。大戰時爲齊墨瓦爾特的右派，即溫和的國際主義者。

Modigliani(毛底連尼)；意大利改良主義的工會首領之一。一九二〇年在莫斯科與達拉哥納同爲赤色職工國際的共同創立者。莫索里尼奪取政權以後，便又與達拉哥納同爲莫索里尼的忠順反對派了。

Noske, Gustav(謨斯克)；德國社會民主黨黨員。在戰前已經是公然的帝國主義者，戰後德國革命殘酷壓迫者，謀害盧森堡及李卜克內西的兇手。

Pankhurst, Sylvia(潘哈斯特)；英國女權運動者。後爲“左派”共產主義者。發行“婦女無畏艦”雜誌(Womens Dreadnought)，後改爲“工人無畏艦”Workers Dreadnoughts。

Plechanow, Georg(普列哈諾夫)；第二國際的最卓絕的馬克思主義者。俄國馬克思主義底理論的始祖。戰時爲社會愛國主義者；十月革命的反對者。死於一九一九年。

Radek, Karl(拉狄克)；彼爾社會黨的黨員，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左派黨員之一。戰時徹底的國際主義者。布列墨(Bremre)“勞動政策”的贊助者，齊墨瓦爾特的左派。革命後爲俄國共產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數年間共產黨國際的執行委員。一九二六年後爲反對派首領之一。

Renaudel(萊諾台爾)；法國社會愛國主義者勃留姆及麗格黨的首領。

Renner, Karl(倫乃爾)；奧大利社會民主主義者，社會愛國主義者，革命後曾任聯邦宰相。

Sassulitsch, Wera(薩蘇理赤)；普列哈諾夫派的黨員，“火星”的編輯之一。一八八〇年刺殺了彼得堡首都司令特列僕夫(Trepow)，後被放逐，逃於外國。戰時爲社會愛國主義者，死於一九一九

年五月。

Scheidemann Philipp (率德曼)；戰前假冒爲“左派”的德國社會民主主義者。戰時是受金錢收買的社會愛國主義者。在企圖挽救專制政治的德皇內閣中，任秘書長。挽救專制政治，沒有成功，後來便爲共和國國民代表。他以雙面的資格，與諾斯克、愛培爾等同爲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首領。

Schroder Karl (施來德)；斯巴達克區的黨員。一九一九年十月海德山大會分裂後，德國共產勞動黨內某派的首領之一。

Snowden Philip (斯諾登)；英國獨立勞動黨的首領。比麥克唐納還要右些。他的妻 Ethel Snowden 一九二〇年遊歷了俄羅斯，但一切都不合她的脾胃，於是在一九二四年寫了一本關於英國現在皇室的書。英國皇室，才中她的心意。

Struve Peter (司特魯維)；從前俄國馬克思主義者之一，其後與 Tugan Baranowski Bulgakow, Berdjajew 同，爲“合法的”馬克思主義者。一八九八年俄國社會民主黨創立大會的(綱領)宣言，是由他起草的。以後成爲修正派，不久又爲立憲民主黨的黨員。現在更成外國帝制的白黨首領之一。

Subatow (蘇巴託夫)；俄皇秘密警察的長官。他以警察的津貼來創立工會。他企圖把工人運動轉到沙皇政府所需要的方向。

Thomas, Albert (湯麥)；法國社會民主主義者，戰時爲軍需總長(!)。現在爲國際聯盟的國際勞動局(即國際聯盟下懲弄工人的機關)的局長。

Tschernow, Viktor (采爾諾夫) 俄國“社會革命黨”的首領(普列哈諾夫在其成立時即說他們是些不革命的社會主義者，沒有社會主義的革命家，攜帶火藥的自由主義者)。大戰時齊墨瓦爾持的代表。退俄後(一九一七年三月或四月)即爲社會愛國主義者，次爲聯合內閣的農業總長兼商工總長，拒絕實行社會革命黨綱領——土地國

有。立憲會議的議長——這個會議純粹不過是一種陳腐的滑稽的兒戲，所以一九一八年毫無困難地就被解散了。以後他成了白軍的煽動家。

Treves (特利文) 意大利極右的改良主義者。

Tschernyschewski (采爾尼雪夫斯基)；十九世紀中葉的俄國革命的(非馬克思的，却是“民衆的”即立脚於“農民社、主義”之上的)作家。他的理論，是傳立葉主義以及農村公社爲社會主義胚胎說的混合物。馬克思會稱他爲大學者。監禁七年，後被流放於西伯利亞。死於一八八〇年末。哲學上他是費爾巴哈(Feuerbach)的學徒。

Turati (屠拉第)；意大利最古的改良主義者。到一九二一年一月利渥爾諾大會爲止，這一派同屬於意大利社會黨。這社會黨曾經是共產國際的同盟者。在利渥爾諾，意大利共產黨從社會黨分裂出來，中央派(塞拉提派，Serati-gruppe)與杜拉提，特利文，毛底連尼，達拉哥納，蒲爾樸利尼(Prampolinm)，威拉(Vella)等仍留於原黨。其後意大利社會黨又經過幾次分裂(馬費派‘Marffi Gruppe’與塞拉提派同加入共產國際)。

Vaillant (魏良)法國老馬克思主義者，戰時成爲社會愛國主義者。死於一九一五年十二月。

中國書局標價
定價
1.50

0
15

定價肆角

125539

特價
¥0.50